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八四年



1984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4 年

致巴金 (1 月 3 日)	(2)
致谢为楫 (1 月 3 日)	(4)
贺叶巴两位	(6)
致巴金 (1 月 16 日)	(9)
致谢为楫 (1 月 17 日)	(10)
题目出得好, 作文就做得好	(11)
致臧克家 (1 月 27 日)	(15)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16)
致巴金 (2 月 10 日)	(20)
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	(21)
《自然·生活·哲理》序	(24)
我家的对联	(27)
致周达宝 (3 月 5 日)	(31)
我入了贝满中斋	(32)
致宫玺 (3 月 30 日)	(43)

悼念伯昕同志	(44)
致谢为楫 (4月9日)	(47)
“六一”寄语	(48)
谈《婴幼儿家庭教育》	(51)
为贝满女中120周年校庆题词	(53)
寄《小学生报》的小读者	(54)
我的期待	(56)
明子和咪子	(60)
致茹志鹃 (5月29日)	(66)
致尤廉 (6月11日)	(67)
致谢为楫 (6月25日)	(68)
花瓶	(70)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	(72)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创作经过	(78)
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	(80)
天南地北的花	(83)
今日上海	(88)
致谢为楫 (9月13日)	(91)
桥	(92)
愿中国妇女实现更多“零的突破”	(100)
《葛翠琳幼儿文学选》序	(102)
致陈恕 (10月6日)	(104)
欢呼《民进妇女》出刊	(106)

致巴金	(10 月 12 日)		(107)
致宫玺	(10 月 21 日)		(108)
美的北京街头			(109)
关于男人 (之一)			
一 我的祖父			(113)
二 我的父亲			(116)
悼念有吉佐和子			(120)
致陈恕	(11 月 9 日)		(123)
忆烟台			(124)
致巴金	(11 月 18 日)		(126)
寄家乡小读者			(127)
致巴金	(11 月 20 日)		(129)
《少年时》序			(130)
致巴金	(11 月 27 日)		(134)
致葛翠琳	(11 月 30 日)		(135)
致陈恕	(12 月 2 日)		(136)
致宫玺	(12 月 4 日)		(138)
再给《小苗》小读者的信			(139)
介绍一篇好散文			
——读叶至诚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			(141)
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			(144)
为《华侨世界》创刊号题词			(148)

致宫玺	(12 月 10 日)		(149)
致陈恕	(12 月 12 日)		(150)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52)
致陈恕	(12 月 24 日)		(155)
致臧克家	(12 月 29 日)		(156)

1984 年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过年只得小林一张贺年片，实在不过瘾！我希望得到你养病的消息。昨天夏衍带着沈宁来了，使我尤其想起你们。陈恕给我们照了相，洗好一定给你看。我们都好，尤其搬家后，和吴青更近了。但是他们也还是很忙，上课时多，当然早晚还是在一起。这两天照例有些朋友来拜年，你虽住医院，恐怕去看的也不少，你进步得快吗？到了百分之几十？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我们的新居宽敞一些，阳光也好。时间如能自己支配，可以多写一些，可惜并不是如此！小林夫妇怎样？端端今年几年级了？我也极想他们。小林会到北京组稿吗？我虽希望见她，但宁可她在你身边。今年北京很暖，昆明都下大雪，北京偏偏不下，也不正常。这信写了两天，不断有人来，就到这里吧。告诉小林，贺年片拜领了，但我还盼她写几个字，祝你飞速进步。

大 姐

一月三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昨天得到大弟的信，知道你得了感冒，心中十分不安，已经给二哥打了电话，叫他也给你写信，好在有大弟在你身边，他很细心，你自己也应保养，现在一定要好好休息，切切！我们搬家后一切都好，小妹一家就在一单元内，照应得方便多了。我只是行动不便，上身的衣服，自己还会穿，文藻似乎更衰老一些，冬天衣服又厚，所以他穿衣裤都要人帮忙，将来春天来了，衣服渐薄，可以好一点。大妹一家每晚回来，宗生一家星期天午饭在家吃，宗生儿子山山已参军，现在西安；大妹儿子丹丹已考人民大学外经系，走读，在广渠门外，很远；钢钢在“立新高中”念三年级；宗生女儿江江、大妹小儿子冰冰都在初中和高小，明年对他们也是一关。最近因为搬家给宗慈、宗恩都写了信，她们都已回信，据说都忙，但还都好。不知你常给她们去信否？我给你的那本香港印的《冰

心》集，他们只给十本，所以除了两个编辑和我自己以外，我只给你和二哥和三个儿女和文藻。香港是从来不给稿费，但印刷得不错，尤其是相片——这信陆陆续续写了两天，因为总有人来打断，多半是文藻和小妹他们的学生来拜年。这信写的长一些，给你消遣，也给大弟看。他信写很好，我愿他好好地照顾，你也不要自己总是自顾自，因为人老了，还是子女最可靠。祝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兰州比北京冷（今年北京太暖了，不正常，病人很多），千万珍摄！

爱你的姐姐

一月三晨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贺 叶 巴 两 位

有同志提醒我，今年是叶圣陶先生九十大寿，巴金同志八十诞辰，我想我应该乘这时候，写几句向他们祝寿的话。

我记得叶老看了我在一九八二年春写的《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时，他笑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在解放后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原来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的嘉庐小住的时候，叶老为了开明书店要出版我的选集的事，曾来看过我。他老人家的记忆力是比我强多了！

叶老是一个十分关怀后辈的人。我和叶老认识以后，还没到他家去拜谒过，因为：一来在公共场合常常会看到他，二来我怕登门拜访，会影响他的休息。但在前年春天，我因病住院时，叶老跑到医院看我，正巧我已出院回家，叶老又同至善同志到西郊我家里来看我。当我躺在床上，意外地看到须发如银的

叶老，走进我的卧室，坐到我的床边，对我亲切地慰问时，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和惭愧！

叶老又是一位十分谦和的老人，每逢我赠送他一本书或写一封信的时候，他必定亲自作复。近来他眼力不好，字越写越大，我知道老人家一定相当吃力，我不得不告诉至善同志，说：叶老以后不必回信了，由至善同志从电话里通知我说书和信收到就可以了。

我和巴金——恕我不称他为“巴老”，因为他比我还小几岁，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看待——认识是从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几十年来，相知愈深。解放后，我们还一同参加过出国的访问团。我们去苏联、日本、埃及……飞机上和国外旅馆中的谈话就更多了。在我的回忆中，有许多场面是值得描写的。最后一次一同出国的机缘，就是一九八〇年春到日本的访问——那次出国，我的女儿吴青和他的女儿小林都参加了，小林叫我“姑姑”，吴青叫他“舅舅”，仿佛我们就是亲姐弟似的——但从日本回来不久，我就病得“足不出户”了。

最近巴金也因病住进了医院。前天他来了一封“长”信，写满了一张三百字的稿纸——他的女儿信里说：“爸爸给您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在他看来，已很久没写过这么长的信了”，——他信里说：“信收

到，我仍在医院治疗，可以说是一天天地好起来……在病房里，常常想起您和调皮的吴青，想起你们我就高兴……我还很乐观。我仍然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我感到自豪，一年中井上靖来医院三次，要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我推辞不掉……现在病房中就为这个目标奋斗，您可以放心了，我还有雄心壮志啊！”

叶老的字是越写越大，巴金的字是越写越小，我得到大字、小字的信，都一样地高兴。前几天《文艺报》一位编辑同志来说：叶老说，不久春天来到，他们院里海棠花开的时候，要请我去赏花。我一定要破“足不出户”的例子，去我从未去过的叶老家里，拜见叶老、并观赏他所种的海棠花。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84年2月29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得你和小林信，十分欣慰！你比我强多了，还有雄心壮志到日本去一趟，好好休养吧！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我们新居很适意，阳光较好，北京又总是大晴天，总使人兴奋。

你若是写信太吃力，就让小林不时报告一些你进步的情况，我只愿你快快痊愈。吴青天天念叨你们，可是她这人太好管闲事，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里一会儿找她又不见了。我一定叫她给小林写一封长长的信。别的不说了，我们全家老小都问你们一家春节好。

冰 心

一月十六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得你信，知道已经好了一点，十分喜慰。最近北京也冷了，零下七八度。我觉得太暖了倒不好。昨天，大妹说她已托朋友给素梅转到兰州事，但愿能成功。你身边是得有人，平时也不要太不要人了，你一病就知道儿女还是有用的！匆匆，我们都好，你好好养病吧。

姐 姐

一月十七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题目出得好，作文就做得好

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难过地说自己做得不好“作文”，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进步。他们的信一般都写得很通顺，说到他们写不好作文的苦恼时，描写得也很生动。我在答复他们的公开信里，只劝他们多读多写，但根据我自己在中学里作文的经验，作文写得好不好和老师出的题目大有关系。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作文老师是一位前清的秀才。他自己做惯了八股文章，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大都是：“思而不学则殆论”，“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要不就是：“教育救国论”或“富国强兵论”，这都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脑子里没有想过的东西！

那么，怎么办呢？回想起我们中学时期的作文活动，还是很有趣很可笑的。

我们的作文时间，是安排在每星期六上午。在一间大课室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四班学生都坐在一

起，老师在黑板上写出四个班的作文题目，就坐在讲台上自己看书，我们乱哄哄地低声议论，他也不管。正因为我们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就可以乱做，我们可以抄书，也可以互相抄袭，一般是以“呜呼，人生于世……”起头。我在家塾里做过小论文，于是在上午三个小时内不但自己写好一篇，还可以替高班或低班的同学写一两篇，来换取糖葫芦或炒栗子的报酬。这些事老师似乎也不是不知道，但只要每一个学生每星期交一篇作文，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心里根本没有想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和思考能力的问题！

这位老师还教我们古文，他讲的《李陵答苏武书》，和“前后赤壁赋”等，我们都很爱听。我们想假如老师出：“与友人书”或“游记”一类的题目叫我们写，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说的话，而且会说得很生动，很有趣，可惜老师就没有想到这些。

我在《三寄小读者》的“通讯四”中曾对小朋友们说过：

“创作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中的真情实事，写出来的东西就不鲜明，不生动；没有生活中真正感人的情境，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感人。古人说‘情之相生’，也就是说真挚的感情，产生了真挚的文字。那么，从真实的生活中，把

使你喜欢或使你难过的事情，形象地反映了出来，自然就会写成一篇比较好的文章。”

我只看了《中学生日记选评》中的三篇日记，篇篇都好！有的描写一家三代人快乐地在一起猜春节联欢会上的谜语，而体会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实质。有的从参加学校的秋季运动会，而体会到：学习也必须拼搏和因为体育健儿心中有个伟大的祖国，所以“他们的微笑就像扬子江上初升的太阳，”等等。有的就描述几家孩子都抢着请五保户王奶奶到自己家去吃年夜饭的热闹情景。这些文章自然流露出作者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于自己未来的向往和努力……

这本集子中所选的日记，大都是“学作文报”举办的“日记、书信、作文一得”三项征文比赛中的获奖作品。我不必把所选的日记全部看完，因为我知道像“日记”这类的文章，每人一定都有自己要说要记的真情实事；一定不会雷同，而且一定都会写得鲜明、生动而真挚。

我认为中学生所以能够写出这些让人爱看的日记，是因为《学作文报》这次征文的题目出对了！

1984 年 1 月 24 日

（本篇刊于《中学生日记选评》，新蕾出版社 1985 年 1 月初版。）

致 臧 克 家

克家同志：

你的雅兴不浅，文藻和我都感谢你用宣纸毛笔写的贺年信，可惜日子早了些，现在还不到“甲子元月”！祝贺
春节！

谢冰心 拜

一月廿七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了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拿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

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此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八〇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学的松冈征子。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贡献。”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啊！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写了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她们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到深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地追记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濑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家。一九八〇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性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下。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一九八〇年我生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

人，也是多次在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仅仅一个多月以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烟火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孩子们大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之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欢庆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长寿。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子夜

（本篇发表于《人民日报》1984年5月2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徐谦(?)同志来了，给我以很大的安慰和喜悦！他说你好多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还想出国之前到杭州去玩，这都是好消息，我听说你拉出去的队伍还不少。那很好，但是笔会中熟人一定也不少，你千万不要太累了，小林跟你走，希望她可以“控制”你！你送的点心，十分好吃，我没有什么回报的，只托吴泰昌给你带上两盒北京的茯苓饼，不知你喜欢否？

祝

康安

大姐 上

二月十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

老舍若是还在，今年该八十五岁了。

我想象：我们几个老朋友，给他开个不大也不小的庆祝会，地点也就在作协的会客室吧。老舍拄着手杖从外面进来了，一进门，笑容满面地向周围看了一眼，把手杖挂在臂上，抱拳拱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至于这位“语言大师”底下还会说些什么欢喜，感谢，幽默的话，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就不会替他说了！

我们中间怎能缺少他这么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有情有趣的朋友，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一个热诚爱国的公民。

我和他过往较密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四川重庆。那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贫病交加之中，支撑起抗战期内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常到我们居住的歌乐山上来，他面色青

白，身体显然不好，但他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一切艰难困苦的情况，他都以诙谐轻松的语气出之。喝过几杯大曲，坐在廊上看嘉陵江的时候，他还常告诉我有某某年轻有为的作家，如果我能见到他或她时，要好好地予以鼓励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他去了美国，我们去了日本，我们还时常通信。他给我们的孩子写信，常以最形象而幽默的话，流露出他忧国思乡的抑郁情绪。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回到北京，他是第一批来看我们的朋友之一。那时他真是神采飞扬，容光焕发，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给他以“狂喜”。他手舞足蹈地、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发生的许多新人新事。

这以后，他心满意足地生活着、工作着。他种花，他养猫，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一篇一篇的充满了地方色彩、民族风格的散文，诗歌，戏剧，从他笔下不断地倾泻了出来。

十年动乱的初期，一阵狂暴的阴风，就把老舍从“狂喜”中卷走了。

就是这么一位可敬可爱的朋友，假如他今天还在，在雨过天晴的七八年之中，不知他还会写出多少比《茶馆》还深刻，比《骆驼祥子》还动人的小说，可惜他走了！

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声音笑貌永远涌现萦绕在我们耳边眼前，他没有走！只要我们还在，年年此日，我们将永远会纪念他的诞辰。

1984 年 2 月 10 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4 年第 3 期。）

《自然·生活·哲理》序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了《自然·生活·哲理》一书，来让我作序。我从头看了这集子里的 36 篇散文，觉得这些散文文字优美，思想健康，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青年读物，便欣然答应了。

古今中外写景咏物的诗文，都是作者从自己主观的眼光和心情中，赋予了他所接触的景或物，以特殊的性格和生命。唐代诗圣杜甫在他《春望》一诗中所写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只是因为作者生活在唐代颠沛流离的乱世，他自己“感时”、“恨别”，从他眼里看去，花也会“溅泪”，从他耳中听来，鸟也会“惊心”，这都是很自然的。

这本集子里三十几篇散文的作者，都是生活在八十年代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他们有坚定的信心、远大的理想、美好的希望，因此这些篇文章的情调是优美的、健康的、引人向上的。作者从自己的生活中接触到的景物，大之如山岭园林，小之如花草

树木、虫鱼鸟兽，触景生情，借物言志，情高意真，读了使人欢欣、奋发。我在每篇读后都摘录了文中的警句——

秦似的《榕树的风度》：

“榕树，它显得魁伟、庄严、恬静、安详……我敬仰青松，但我却更喜欢榕树……”

戴永夏的《落花吟》：

“她不消沉，不悲观，‘得意淡然，失意夷然’，总是专注地倾心于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地作着‘护花’的工作。”

金马的《蝼蚁壮歌》：

“万众一心，不畏庞然大物，不自菲弱小，却能叱咤森林，云游四方，所向无敌。”

余家富的《昆仑情思》：

“她的高大磨练我的意志，她的坦荡舒展我的胸怀，她的严寒启迪我的神智，她的神秘激发我的求知欲。”

韩少华的《雨的精魂》：“是雪……圣洁的雪不就是天地间雄风正气所凝聚成的不死的精魂么！”

项目桦的《桥》：

“让我们在新长征途中，为早日实现‘四化’，争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先行官’。”

不必再多引了！从岑献青、陈贵贤、赵丽宏和韩

静霆等人的《九死还魂草》、《垂柳赋》、《冰霜花》和《绣球花》中都看出“美”来！可以说，这本集子里每一篇文章里，都有“自然”、“生活”和“哲理”，我愿青年人都能读到它。

1984年2月15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4年4月2日。）

我家的对联

我对人家墙壁上挂的字画都有兴趣，尤其是对联，这兴趣是从小就养成的。我在一九七九年写的那篇《我的童年》里曾经提到，我的第一本课文就是一副对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但从这一副对联里还看不出屋主人的身世和襟怀，爱好和性格。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老家福州去，看见在后厅墙上我的曾祖父画像的两旁，有我的祖父写的一副对联：

谁道五丝能续命
每逢佳节倍思亲

原来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那天逝世的。我国习俗在端午节那天都给小孩子的手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叫做续命丝，祝他长命百岁。所以每到端午节我的祖父看到孩子们手腕上的五色丝，就会想到他的父亲，而对“五丝”能否“续命”，起了悲哀的疑问。

此后，我就注意我们老家的厅堂客室里的每一副对联，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祖父自己写的，如：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是一对自勉的句子，就充分地描绘出我的祖父的恬淡而清高的性格。

再大一点，在北京剪子巷父亲的客室里，看到一副前清御史江春霖老先生送给父亲的对联：

庠舍争归胡教授
楼船犹见汉将军

在上联旁边还有小字，说他“自京南下，阻雪难行”，在芝罘会见了我的父亲，很喜欢他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的风度，就写这一联相赠。父亲对我

解释这对联的时候，也说他和江春霖只是初交，当时江春霖因为弹劾了庆亲王而被罢官，他也很佩服江春霖不畏权贵的风骨，因此才把这位“交浅言深”的朋友的赠品，张挂起来的。

三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客室里又添上一副萨镇冰老先生送的对联：

穷达尽为身外事
升沉不改故人情

说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几十年金坚玉洁的友情。四十年代初父亲逝世时，我不在北京，这些珍贵的遗物，都不知哪里去了！

长大以后，到了美国和欧洲，在外国朋友家里当然看不见对联，有的只是画框和祖先的相片。在日本，旧式的屋子，周围几乎都是纸门，只有“床之间”那一扇墙上可挂字画，但也不是对联，而是一幅很雅淡的字或画，再供上一瓶一枝花朵，倒也雅洁可喜。日本的亭园，和中国的相似，有山有水，也许还更古雅一些，但是楹上柱上都没有对联。欧美的林园更不必说了！

我这一辈子，在师友家里或在国内的风景区，到处都可看到很好的对联。文好，字也好，看了是个享

受。我以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特有的美好传统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起耳濡目染，给他们一个优美的艺术的气氛！

（本篇最初发表于《艺术世界》1984年第3期。）

致周达宝

达宝同志：

请代问出版社各位我认识的同志们好！

你的信和《画魂》都收到了，感谢之至。

我还好，只是老伴吴文藻生病，自二月十三日起住进医院，未免忙碌一些，现他高烧已退，正在调理心、肺、脑部的病。孩子们每天去看，并请有“特护”，请放心。

我已搬家两个月，在和平楼隔壁新楼上。有空请来玩，祝好！

冰 心

三月五日

我入了贝满中斋

我在北京闲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提起我入学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适应这陌生而古老的环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学。那时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们读书以外，也十分无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么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和青年会干事们交上朋友（他还让我的大弟谢为涵和他自己的儿子杨建辰到青年会夜校去读英文）。当我舅舅向他的青年会干事朋友打听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我的父母并不反对我入教会学校，因为我的二伯父谢葆滌（穆如）先生，就在福州仓前山的英华书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二伯父的儿子，我

的堂兄谢为枢，就在那里读书。仿佛除了教学和上学之外，并没有勉强他们入教。英华书院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也到我们福州家里来过。还因为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没有经过消毒，他们都得了脐带疯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我还记得给我弟弟们接生的美国女医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国式的上衣和裙子，不过头上戴着帽子，脚下穿着皮鞋。在弟弟们满月以前，她们还自动来看望过，都是从山下走上来的。因此父母亲对她们的印象很好。父亲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文的口语也纯正，你去上学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带我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报名。

那时的贝满女中是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的转折处，东南面的楼壁上，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公理会就有培元蒙学（六年）、贝满中斋（四年）、协和女子书院（四年），因为在通县还有一所男子协和书院，女子书院才加上“女子”二字。这所贝满中斋是美国人姓 Bridgeman 的捐款建立的，“贝满”是 Bridgeman 的译音——走

上十级左右的台阶，便进到楼道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就是校长吧，把我领到一间课室里，递给我一道中文老师出的论说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这题目是我家塾中做过的，于是我不费思索，一挥而就。校长斐教士十分惊奇叹赏，对我舅舅说：“她可以插入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考试和入学的手续是那样地简单，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是又高兴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带着一学期的学费（十六元）去上学了。到校后检查书包，那十六元钱不见了，在校长室里我窘得几乎落下泪来。斐教士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丢了就不必交了。”我说：“那不好，我明天一定来补交。”这时斐教士按了电铃，对进来的一位老太太说：“叫陶玲来。”不久门外便进来一个二年级的同学——一个能说会道、大大咧咧的满族女孩子，也就是这个陶玲，一直叫我“小谢”，叫到了我八十二岁——她把我带进楼上的大课堂，这大堂上面有讲台，下面有好几排两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学生自修和开会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级的座位上坐下。这大堂里坐着许多这时不上课的同学，都在低首用功，静默得没有一点声息。上了一两堂课，到了午饭时间，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学们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动跟了去。下午放了学，就赶紧抱起书包回

家。上学的第一天就不顺利，既丢了学费，又没有吃到午饭，心里十分抑郁，回到家里就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补交了学费。特意来送我上学的、我的二弟的奶娘，还找到学校传达室那位老太太说了昨天我没吃到午饭的事。她笑了，于是到了午饭时间，仍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斋二同学陶玲，带我到楼下一个大餐厅的内间，那是走读生们用饭的地方。伙食不错，米饭，四菜一汤，算是“小灶”吧。这时外面大餐厅里响起了“谢饭”的歌声，住校的同学几乎都在那里用饭。她们站着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馒头、窝头，饭菜也很简单。

同学们慢慢地和我熟了，我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从保定、通县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会女子小学升上来的，也几乎都是住校。她们都很拘谨、严肃，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分朴素。刚上学的一个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郁闷。圣经课对我本来是陌生的，那时候读的又是《列王纪》，是犹太国古王朝的历史，枯燥无味。算术学的又是代数，我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只学到加减乘除，中间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 62 分，不及格！这“不及格”是从我读书以来未曾有过的，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写在《关于女人》中《我的教师》一段里。这位教师是丁淑静，她教过我历史、地理、地质等课。但她不是我

的代数教师，也没有给我补过课，其他的描写，还都是事实。以后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里，由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教师，给我补了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课目，连圣经、英文我的分数几乎都不在 95 分以下，作文老师还给过我 100 加 20 的分数。

慢慢地高班的同学们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们也很淘气，很爱开玩笑。她们叫我“小碗儿”，因为学名是谢婉莹；叫我“侏子”，因为我开始在班里回答问题的时候，用的是道地的烟台话，教师听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写出答案。同学中间到了能开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们之间已经亲密无间。我不但喜爱她们，也更学习她们的刻苦用功。我们用的课本，都是教会学校系统自己编的，大半是从英文课本翻译过来的，比如在代数的习题里就有“四开银角”的名词，我们都算不出来。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留学，用过 quarter，那是两角五分的银币，一元钱的四分之一，中国没有这种币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从《资治通鉴》摘编的“鉴史辑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也是从 A Boy A Peach 开始，教师是美国人芬教士，她很年轻，刚从美国来，汉语不太娴熟，常用简单的英语和我们谈笑，因此我们的英文进步得比较快。

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

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以前，由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给我们讲半小时的圣经故事。查经班和做大礼拜对我都是负担，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亲和弟弟们整天在一起，或帮母亲做些家务，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经班里有许多我喜欢的同学，如斋二的陶玲、斋三的陈克俊等，我尤其喜欢陈克俊。在贝满中斋和以后在协和女子大学同学时期，我们常常一起参加表演，我在《关于女人》里写的《我的同学》，就是陈克俊。

在贝满还有一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们练习演讲辩论的集会。这会是在大课堂里开的。讲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节目；还有书记，记录开会过程；台下有记时员，她的桌上放一只记时钟，讲话的人过了时间，她就叩钟催她下台。节目有读报、演说、辩论等。辩论是四个人来辩论一个题目，正反面各有两人，交替着上台辩论。大会结束后，主席就请坐在台傍旁听的教师讲几句评论的话。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第一次是让我读报，我走上台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

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还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席发言。

我入学不久，就遇到贝满中斋建校五十年的纪念，我是个小班学生，又是走读，别的庆祝活动，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一天有许多来宾和校友来观看我们班的体操表演。体育教师是一个美国人，她叫我们做下肢运动的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往右撇，回来！”我们大家使劲忍着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学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军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那时袁世凯正密谋称帝，想换取日帝对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我们也是群情愤激，和全北京的学生在一起，冲出校门，由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斋四同学李德全带领着，排队游行到了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在万人如海的讲台上，李德全同学慷慨陈词，我记得她愤怒地说：“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兵淹死呢！”我们纷纷交上了爱国捐，还

宣誓不买日货。我满怀悲愤地回到家来，正看见父亲沉默地在书房墙上贴上一张白纸，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父亲和我都含着泪，久久地站在这幅横披的下面，我们互相勉励永远不忘这个国耻纪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在斋二这年的上半季，袁世凯公然称帝了，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还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黎元洪和我父亲是紫竹林水师学堂的同级生，不过我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来往。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副总统，住东厂胡同，他曾请我父亲去玩，父亲都没有去。这时他住进了瀛台，父亲倒有时去看他，说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从来不知道父亲会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亲都在制服呢裤下面多穿一条绒布裤子，说是那里房内很冷。

这时全国又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灭了。校园内暂时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

体”、“复活”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也没有入教做个信徒。

贝满中斋的课外活动，本来很少，在我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我们坐洋车到了西直门，改骑小驴去西山。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兴奋。忆起童年骑马的快事，便把小驴当成大马，在土路上扬鞭驰骋，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在会上我们除开会之外还游了山景，结识了许多其他女校的同学，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衣着比我们讲究。我记得当女青年会干事们让陈克俊和我在一个节目里表演“天使”的时候，白绸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学借的。

开完会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乱哄哄的了。谣言很多，说是南北军阀之间正在酝酿什么大事，张勋的辫子军要进京调停。辫子军纪律极坏，来了就会到人家骚扰。父亲考虑后就让母亲带我们姐弟，到烟台去暂避一时。

我最喜欢海行，可是这次从塘沽到烟台的船上，竟拥挤得使我们只买到货舱的票。下到沉黑的货舱，里面摆的是满舱的大木桶。我们只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面上铺上席子。母亲一边挥汗，一边还替我们打扇。过了黑暗、炎热、窒息、饥渴的几十小时，好容

易船停了，钻出舱来，呼吸着迎面的海风，举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罗列在我面前，心里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亲的朋友、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伯伯，来接我们。让我们住在从前房子的西半边。在烟台这一段短短时间里，我还带弟弟们到海边去玩了几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写过我当时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对面芝罘岛上灯塔的灯光，却和以前一样，一闪一闪地在我心上跳跃！

复辟的丑剧，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只演了十二天，我们很快就回到北京，准备上学。

贝满中斋扎扎实实的四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们毕业时全班只有十八个人。我以最高的分数，按照学校的传统，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我的同班从各教会中学升上来的，从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书，风流云散了！只有我和吴撈梅、邝淑贞和她的妹妹，我们这些没有教学的义务的，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

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写这四年认真严肃的生活。这训练的确约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进入大学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前，准备好一个比较稳静的起步。

1984 年 3 月 14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84 年第 4 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得您信，很高兴。最近因为老伴病了，住院四十天才回来，忙一些。他人仍虚弱，需要调理。文集第三卷，六月能出，就好。贵社《艺术世界》吴承基同志，您见得着否？他要我写的《漫谈对联》，改名为《我家的对联》，也好。如不改，我还有关于对联的短文章给他，我不另写信了。匆匆祝好！

冰 心

三、卅

悼念伯昕同志

总在悬心而又不愿听到的消息，终于听到了！民进中央给我送来了徐伯昕副主席不幸于三月二十七日病逝的信，也许是因为春寒吧，我只觉得双手冰冷。我的小女儿说：“徐伯伯逝世的那一天，葛志成伯伯就有电话通知了，因为爸爸刚刚出院，所以也没敢告诉你们，怕你们伤心。”

但是我们怎能不伤心呢？

我们和徐伯昕同志相识，还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加入了民主促进会以后；虽然在这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解放前就是出版界的闻人，邹韬奋老先生的亲密战友。他们办进步刊物，屡次被封，屡次再办。他们在国民党的残酷包围中，艰苦奋斗的事迹，当时知识界人士是一致颂扬的。

在我们和徐伯昕同志将近三十年的交往接触中，深深地感觉到他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是个最好的党的助手。他工作得十分认真，极端负责，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同志们又是十分恳挚，亲切。在三十年不平静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十年动乱的年月，他总给我们以最大的关怀。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我参加过的民进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伯昕同志主持会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每当会议结束之前，他还总是恭谨地问周建人主席、叶圣陶副主席有什么指示没有？这种勤慎的工作态度，我们都应当向他学习！

我记得伯昕同志有一个时期颈部有病，常常直不起头来。一九七二年我们从干校回来，他还扶病来看我们，愉快地告诉我们：在他东城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多花，要我们去看。我知道在他没有工作可谈的时候，也要把轻松愉悦的气氛来感染鼓舞我们。

在他卧病住院的日子里，我每月到北京医院检查，总想法到楼上病房去看望他。病魔已在残酷地折磨着他，我看他一次比一次瘦弱，但他还是同我谈工作，最后一次，也就是今年二月间吧，他问我对于民进领导班子的安排，有什么意见没有？我笑着对他说：“新来的领导我都见过了，真是好得没说的！”他也满意地笑了。那时在他的病床边，还有一位大夫正在为他按摩他那已经失去知觉的双腿。他似乎是特意和我说起，将来他好了出院之后要如何如何，他也许在安慰我，也许在安慰自己！我听着他那气力不足

的谈话，我就已经想到不知道我还能看望他几次！

伯昕同志再也不能同我们谈工作了。我们悼念他，要永远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工作上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三十年来在他的领导培养之下，民进有了一班像他那样勤谨、认真、苦干的中青年干部，这是民进的骨干力量！我是做不了多大工作了，但我仍愿同民进的老、中、青的同志们在一起，和我们亲爱的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永远做党的好助手。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进》1984年第4期。）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信收到多日，你给文藻的信，我也念给他听了。他已于三月底出院，人仍虚弱，连看报看信都不行，人老了也没办法。二哥二嫂来过看他，买了鸡和牛肉，二哥也总是咳嗽。我们这些老人，只好乐天知命，互相安慰，自己保重。大弟来过，他很好，调素梅的信，我已写给兰州统战部了，不知有效否？保重自己吧！

姐 姐

四月九日

兰大方面有秭佩是大妹好友，有事和他商量。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六 一” 寄 语

亲爱的小朋友：

我因为行动不便，冬天更没有出门。这几天听说外面不但粉红色的山桃花和嫩黄色的迎春花都已开过，连雪白的大玉兰花也在开着！小朋友，春天来了，你们课余之暇，都忙着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中国两亿的小朋友，应该响应党和政府“绿化祖国，造福子孙”的号召，而紧张劳动起来。

我深信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你们在校园或在自己的庭院里栽花种树——住在农村或祖国边疆的小朋友们的活动园地，一定更大——至少也为自己家的阳台或窗台上的盆花，松土、施肥、除虫，浇水。在温暖的阳光下，清新的空气中，作这种户外的有效劳动，是使人心旷神怡的。当你们看到你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花木，一天一天地萌茁生长、开花结果的时候，你的心将怎样地喜悦满足呢？

你们会想到“绿化祖国”，立竿见影的实践，我想你们也许不会体会到“造福子孙”这桩似乎还很遥远的事业。你们会因为自己当了小园丁，而感到喜悦满足，你们可曾通过自己的辛勤实践，把自己当作地上的一棵幼苗，枝上的一朵蓓蕾，而体会到培育你们的园丁——老师的辛苦呢？

老师们为使你们在德、智、体、美四个方面的健康生长，而细致深入地工作着。他们时刻守护调理着使你们都能受到“三热爱”教育的阳光和雨露，不受精神污染的虫害的侵袭。他们为着祖国和人类的光明未来，为着把你们造就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合格接班人，而呕尽了他们的心血。我希望你们不辜负园丁们的培育，为祖国、为人民而激励奋发，努力生长为一棵成材的树、一朵丰满的花！

古人诗中有“恐雨太寒晴太暖，为花连日作春阴”。这两天正是“春阴”天气。这和老师们对你们严格要求和循循善诱之间，尽量平衡的方法和心情，有什么两样呢？

联想得太多了，信就写到这里吧，愿你们都自觉地爱你们的老师，尊敬他们正在做的伟大神圣的教育事业！

你们忠诚的朋友 冰 心

1984 年 4 月 12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教工》1984 年第 6 期。）

谈《婴幼儿家庭教育》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婴幼儿家庭教育》（电视讲座）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关于婴幼儿家庭教育方法讲的最细致、详尽、深入的一本书（尤其是对目前独生子女的婴幼儿教育，针对地提出了很正确及时的建议）。这在康克清同志给本书写的序文和“编者的话”中都叙述得很透彻清楚了。近年来我们重点抓了对学生进行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大学老师们就希望抓好中学教育，中学老师们也希望抓好小学教育。归根到底，最重要的还是要抓好婴幼儿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会种庄稼的一定要选种、育苗，就这个道理。

最近我们的教育方针，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感到这本《婴幼儿家庭教育》有向社会推荐奖励的价

值。

1984 年 4 月 19 日

为贝满女中 120 周年校庆题词

发扬爱国、爱校、团结友爱的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最大的努力！

贝满女中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冰 心

一九八四年四月

（本题词最初刊于贝满女中——女 12 中——166 中校友联谊会、北京市 166 中学党支部合编的《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册》。）

寄《小学生报》的小读者

亲爱的小读者：

辽宁《小学生报》的一位编辑来和我说：他们这次发起的小学生书信比赛，参加比赛的书信有一万四千多封，其中有三百多封是写给我的。他挑出一封江苏无锡胜利门小学华青小朋友的信给我看，要我写几个字。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天都收到小朋友们从各地的来信，内容都差不多，我不能一一回答，正好借此机会，一并作复。

小朋友们的信，总是先祝愿我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然后说他们是怎样地爱读我的《寄小读者》，对这一点我是十分感谢而又惭愧。他们接着就问我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三寄小读者》（通讯四）中已经讲过了。华青小朋友的老师朱先生教导她的“多读、多看、多思、多写”，就是很好的方法。

华青小朋友信上最后说：“我们少年一代决不会辜负老一辈的殷切希望，要赶上老一辈，超过老一辈，让祖国文艺宝库增添更多艺术珍品。”这正是我的希望！

我祝愿你们进步、成功！

你们热诚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学生报》1984 年 6 月 1 日。）

我的期待

“六一”节快到了，人人都应该为儿童做一件好事。那么，我向许多中青年作家（这里面不包括儿童文学作家）问一句话：你们想做件不大也不小的好事吗？

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同志，要我“号召”中青年作家、尤其是已成名的中青年作家都来为儿童写作，至少拿出一个作品。这使我想起三十年前，人民日报曾为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工作，专门发表过社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也曾作过号召和部署，并且确实有许多作家为少年儿童献出一大批好作品来。今天要我来“号召”，我有自知之明，我哪有“号召”的资格！叫我“呼吁”，也很没劲，因为你们有的已是成名的作家，一定门庭若市，不知有多少报纸刊物向你们呼吁索稿，听得太多了，也就不放在心上。我真想以“我的挑战”为题，但是“水来土掩，兵到将迎”，我又有什么挑战的本领呢？

我记得从前有位名人说过：“你要听黄莺叫，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逗着它叫，一个是等着它叫。”我想，对于这些黄莺似的中青年作家们，我不会逗，但也还有等待之一法。

对于许多中青年作家，不论是男的、女的、熟悉的、没见过面的，我都是从心里拜服。你们写的许多作品，都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你们写的改革家、新型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个个都从纸上站了起来，给我留下极其独特的深刻印象。在这里恕我就不一一写出篇名和人名了。然而，使我十分觉得缺憾的是，你们作品的中心人物，很少是一个儿童，一个八十年代的少年，这是为什么？

你们是没有生活吗？你们的周围没有少年儿童吗？你们没有和孩子接触过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即或是还没有做妈妈爸爸，至少也做过姑姑、舅舅、叔叔、阿姨吧。

你们所以不写儿童，是不是感到儿童的生活太平凡了呢？既没有矛盾，又没有斗争，也很少曲折动人的情节。也许有的同志认为，一个已经用自己的力作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拿牛刀去割鸡，未免有点不值得了。

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深入他们的生活，你

们和儿童的接触，可能还比较浅泛。有的同志也许以为，拉过一个孩子拍拍他的脑袋，摸摸她的肩膀，问一声“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上学了没有？”……再送给他一把小枪，给她一个小娃娃，或几本小人书，几块巧克力，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倘若他们接过这些礼物，说一声“谢谢”，回头就走，那你就吃了他们的闭门羹！倘若他接过小枪来，要和你和他一同瞄准；她接过娃娃来，要和你和她一同替它洗澡；接过小人书来，就坐在你的怀里，要和你和他一同翻看；接过巧克力来，先拿一块放在你嘴里，你就算跨进了他们生活的门槛。

他们的天地宽阔得很！他们有他们的宏观世界，当他指点你看一颗流星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微观世界，当他蹲着看蚂蚁打架的时候。他们对周围一切的人（父、母、师、友）和物（花、鸟、虫、鱼）都有极其缜密的观察，极其细腻的感情。他们有极大的自尊心，也有极深的自卑感。他们心里也有矛盾，也有斗争。他们有希望也有幻想，他们会狂喜，也会失眠；尤其是他们对未来，对二〇〇〇年，有着极其丰富、极其新奇的向往和追求。……总之，一旦你和他们心投意合，平起平坐，从他们眼中来看周围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比大人的丰富得多，高大得多，而且充满了诗意和戏剧性。

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们，你们何妨弯下腰来，拉着孩子的手，一同进入他们的世界。你们何妨小试机锋，把你们特长的幽默、尖刻、细致、雄浑的如椽大笔，来描写你身边的一个儿童。我不要求鸿篇巨著，只要你们写一两千字，甚至只几百字，让人们看了，觉得有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八十年代的新一代，站在我们的面前，我就和上亿儿童一起，感激不尽了。

1984 年 5 月 12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18 日。）

明 子 和 咪 子

明子的真名不叫明子，他姓徐，叫徐明。咪子的真名也不叫咪子，它是一只猫，叫咪咪，明子和咪子是奶奶给他们的爱称。

咪子是明子给奶奶抱来的。奶奶退休后，闲多了，不但要明子和爸爸每天来吃晚饭——因明子的妈妈得到“交换学者”的奖学金，到加拿大进修一年——还要找些别的事做，像在阳台上种些花草什么的，因此明子就想劝奶奶养猫。

明子最爱猫了，但是妈妈不爱猫，说：猫不像狗，它到处爬，到处跳。一会上桌，一会上床，太脏了。无论明子怎样央告，妈妈总是不肯。如今妈妈出国了，楼上的陈伯伯——爸爸的同事——他家又有了三只小猫，长毛的，个个像毛茸茸的小花毛团似的，可爱极了。大家都说陈伯伯太爱猫了，送走一只猫，就像嫁出去一个女儿似的，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家，他才肯给。明子想，说是我奶奶要，他不会不答

应吧，我去试试看。

第二天一放学，明子就上楼对陈伯伯赔笑说：“我奶奶您认识吧？她最爱猫了，她退休了闲得慌，想要您一只小猫作伴，行不行？”陈伯伯看着他笑说：“你奶奶要，可以抱一只去……”明子又赔笑说：“我把三只都抱去给奶奶看，立刻就送回来。”陈伯伯只好让他把三只小猫都放进书包里，他挎上书包，骑上车飞快地到了奶奶家。

奶奶家住得不远，骑车三分钟就到了，奶奶还给明子一大把门的钥匙，可以一直进去。明子兴冲冲地进去时，奶奶正在给妈妈写信呢。明子从书包里把小猫一只一只放在书桌上，它们一边低头闻着，一边柔软轻巧地在笔筒、茶杯和台灯中间穿走。其中有一只是全白的，只有尾巴是黑的，背上还有一块小黑点。就是它最活泼了。一上来就爬到奶奶手边，伸出前爪去挠那支正在摆动着的笔。奶奶一面挥手说：“去！去！”抬起头来一看，却笑了说：“这只猫有名堂。这黑尾巴是条鞭子，那一块黑点是个绣球。这叫‘鞭打绣球’……”明子高兴得拍手笑了说：“好，好，‘鞭打绣球’，就留下它吧。”奶奶笑着说：“要留下它，也得先送回去。我们要先给它准备吃、喝、拉、撒、睡的地方。”

明子连忙又把小猫送回给陈伯伯，说：“我奶奶

谢谢您啦，她想要那只有黑尾巴的。”——他不敢把“鞭打绣球”这好听的名字说出来，怕陈伯伯不舍得——陈伯伯一边把小猫放回母猫筐里，一边说：“好吧。你一定也常去玩了？可你不能折磨它。”明子满脸是笑，说：“哪能呢！我们准备好就来抱。”一回头就跑。

明子帮着奶奶找出一只大的深沿的塑料盘子，铺上炉灰，给咪咪做厕所；两只红花的搪瓷碟子，大的做咪咪的饭碗，小的做咪咪的水杯；还有一只大竹篮子，铺上一层棉絮，做咪咪的卧床。奶奶说：“咪咪可以睡在我的屋里，但是‘吃’和‘拉’只能在厨房桌子底下，夏天还得放到凉台上去，不然，臊死了。”这一切，明子都慨然地同意了。

咪子抱来了，真是活跃得了不得！就像妈妈说的，整天到处跑，到处跳，一会儿上桌，一会儿上床，什么也要拨拨弄弄。于是奶奶就常给它洗澡，洗完了用大毛巾裹起来，还用吹风机把湿毛吹干了。早饭后在洗牛奶锅的时候，还用一勺稀粥先在锅里涮一遍，又把自己不吃的蛋黄，拌在牛奶粥里给咪子吃。奶奶把咪子调理得又“白”又“胖”，就像一大团绒球似的！咪子平常很闹，挣扎着不让明子抱它，但是吃饱之后就又贪睡。奶奶常在晚饭前喂它，什么鱼头啦、鸡爪啦，剁碎了给它拌饭。咪子一直在旁边

叫着，等奶奶一放下它的饭碗，它就翘着尾巴过去；吃完了，用前爪不住地“洗脸”，洗完脸就懒洋洋弓起身来，打着呵欠。这时明子就过去把它抱在怀里，咪子一动不动地闭上眼，蜷成一团。明子轻轻抚摸着它，它还会轻轻地打着“呼噜”。每天晚饭后，奶奶和爸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闲谈。明子只坐在一旁，静静地抱着睡着的咪子，轻轻地顺着它的雪白的长毛摸着，不时地低下头去用脸偎着它，电视荧幕上花花绿绿地人来人往，他一点也没看进去。等到“新闻联播”节目映完，爸爸就会站起来说：“徐明，咱们走吧。你的作业还没做完呢！和奶奶说再见。”这时明子只好把柔软温暖的咪子放在奶奶的膝上，恋恋不舍地走了。

这个星期天中午，奶奶答应明子的请求，让爸爸带陈伯伯来吃午饭，说是请他来看咪咪长得好不好，并谢谢他。陈伯伯来了，和奶奶寒暄几句。明子把咪子举到他面前，他也只看了一眼。他一边吃饭，一边和爸爸大讲起什么电子计算机，怎样用编成的语言，把资料储存进去啦，用的时候一按那键子，那资料就出来了什么的。明子悄悄地问奶奶：“电子计算机是什么样子？对养猫有没有用处？”奶奶笑着说：“我也说不清。我想要把咪子的资料装进去，要用的时候，一按键子也会出来吧。”吃过饭，陈伯伯谢过奶奶，

说：“下午还要去摆弄计算机，先走了。”爸爸也说：“徐明还是跟我回去午睡吧，起来还要给妈妈写信呢。”明子只好把咪子抱起，在脸上偎了一下，跟着他们走了。

明子回到家一上床就睡着了。他忽然做了个梦，梦里听见咪子一声一声叫得很急，仿佛有人在折磨它。四周一看，只见眼前放着一个大黑箱子，似乎就是那个电子计算机了，咪子在里面关着呢。它睁着两只大圆眼，从箱子缝里望着明子不住地叫。明子急得嗒嗒地拍着那大黑箱子，要找那键子，就是找不着！

他急得满头大汗，耳边还听见嗒嗒的声音，睁眼看时，原来还睡在床上，爸爸正用打字机打着给妈妈的信呢。明子翻身下床，摘下挂在墙上的奶奶家大门的钥匙就走，爸爸在后面叫他“别去吵奶奶了……”他也顾不上答应。

奶奶家的大门轻轻地开了，奶奶的房间也让他推开一条缝。奶奶脸向里睡着呢，咪子趴在奶奶的枕头边，听见推门的声音，立刻警觉地睁着大眼，一看见是明子来了，它又趴了下去，头伏在前爪上，后腿蜷了起来，这是它兴奋前扑的预备姿势。

明子侧身挤进门来，只一伸手，这一团毛茸茸的大白绒球，就软软地扑到他的胸前。明子紧紧地抱住它，不知道为什么，双眼忽然模糊了起来……

1984 年 5 月 18 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30 日。)

致 茹 志 鹃

志鹃同志：

你四月九日的信早已收到了，光年从上海回来，也给我来过电话。你们同游之乐，我真羡慕，我何尝不喜欢江南风物？而且各地邀我出去玩的人也不少，你知道我是好动的人，可天偏让我瘸了一只腿！只好梦游了。巴金我常有信去，他写字很慢（帕金森病弄的），但给我的信还相当长，说实话，萧珊去后，巴金是差多了！人生总不免有死，你应该珍惜目前的生活，问安忆好，有空来信。

冰 心

五、廿九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尤 廉^①

尤廉同志：

昨天，从陈于化同志送来东方玫瑰花公司的花篮一个，十分艳雅，感谢之至！

因病不多书。祝
好！

冰 心

六，十一

① 尤廉，现为福建科技出版社副编审。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得你信，十分高兴。（五月廿五日，怎么走了一个月？）二哥常有电话，常问到你们，我已将你信，转给他看了。文藻还是很弱，晚上自己都不能起来小便，所以晚上还要人帮忙，着急也没有办法。我跟大弟说过，白天的保姆能否延长一些，能不能找一个人陪陪你，给你洗澡等等。每月钱归我付，你斟酌看。北京有时很热，小妹选上海淀区人大，宗生选上西城区人大，孩子们都忙，大妹也选上外语学院英文系领导班子，她也忙。我们反正哪都不去，也不能去，在家养着就是有福，我想你能有地方住，暂时也不要工作，只要安心静养就好，我这里有书就给你寄去。宗慈、宗恩、小弟他们有信否？闲了也多和孩子们联系，不要光等他们写信。二哥处你也可写信。我还可以，比文藻强，反正行动不便，不参加社会活动更好。兰州一直比北京凉快，你自己保重！

姐 姐

六月廿五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花 瓶

从前妇女最忌讳人家说她是一只花瓶，其实花瓶有什么不好？它是养花的器具，是家庭或公共场所最需要而又最美观的装饰品。现在的家庭或公共场所——尤其是医院和旅馆里的花瓶，不是太少，而且简直是没有！

近年来因病住院的时间多了，去看望病友的时间也多了，总感到病人需要的不是水果，不是糕点，而是花朵。看望你的朋友走了，他们留下的花朵，放在床头，它的光色和清香，总会使你想起你和你的朋友之间、或其他的美好的往事。

我忆起许多年前，在国外旅行或生病的时候，无论我收到多少花束，医院或旅馆都有大大小小的花瓶来供养它。欧美和日本，经常以花为礼物，而且都是切花，不论是花店里买来的，或是自己庭院里花树上剪下来的。

现在我们的医院和旅馆里，就很少有花瓶的设

备——有的医院的高级房间里，甚至有彩色电视，却唯独没有花瓶——使得看望病友或欢迎远方来客的人，纵然送了鲜花，也无处可插，这对于赠受两方，都是最扫兴的事！

我觉得在医院和旅馆里的设备里，花瓶应该会比较必需的一项。在一间素雅幽静的房间里，床头或书案上，放上一只和房间色调配合的花瓶，再插上几朵鲜花，会使这房间生色不少。

现在祖国正在欣欣向荣，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大大地提高了。为着保健工作的需要和旅游事业的发达，医院和旅馆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这都是病患者和旅游者的福音。我希望这两种建筑的设计者们，在室内装饰方面，除了窗帘、桌灯等等之外，还加上花瓶一项，那么，我们制造陶瓷、玻璃、景泰蓝……之类的企业，也可以在花瓶设计上大显身手，为生产百千万只美观而适用的花瓶忙碌一番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4年7月6日。）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我八十多年漫长的生命道路上，只有最后这三十五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过的才是扬眉吐气的痛快日子！

1900年10月，我呱呱坠地，就坠在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被帝国主义者蹂躏所造成的伤痕斑驳的大地上！这一年是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的一年，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了空前浩劫——以后我在国外留学和旅行的时候，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室里，往往看到被劫掠去的中国的宝贵文物！

当我幼小无知的时候，我在山东烟台的山陬海隅，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在我刚懂事的年龄，大约是八九岁吧，有一天傍晚，我和作为海军学校校长的父亲，坐在海滩的柔沙上，欣赏晚霞的时候，半天沉默的父亲，忽然十分愤慨地对我说：“你以为烟台的海边是最美的，我们中国北方海岸的

港湾好看的多得很，威海卫、大连湾、青岛等许多地方，都不在烟台以下，但现在这些海口都不在我们手里，威海卫被英国占领，大连湾被日本占领，青岛被德国占领。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荒凉偏僻的烟台窝里？我们是被逼、被挤来的啊！”

接着他又悲愤地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那时他是威远战舰上的枪炮二副。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后，他才把在烟囱上烤焦了的肠子撕下来，卷起放进他战友的腹腔里。他说：“这些情景，都像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永远悬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割的地，赔的款还少吗？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到外国去访问，如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我觉得我们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啊，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去了！”

父亲在那一个美丽的黄昏所讲的一席话，突然在我幼小的澄净的心灵天空里，卷起一阵浓黑的乱云，在我稚嫩的心房上，压上一块巨大的岩石，我的天真无邪的双眼，从此忽然注意到许多使我也抬不起头来的事物！我站在海滩上，看到每天从海面的水平线上都有挂着形形色色外国旗帜的军舰和商轮出

出进进。每年夏天还总有几艘美国军舰到此度夏，也几乎每天都有酗酒和凶杀的事情发生。不大的烟台市，也有许多日本的酒馆、商店和妓院。当我十一岁那年，全家坐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从烟台到上海去，船上有许多欧洲人趾高气扬地倚在“大餐间”的船栏上，向客舱里扔着果核，那“大餐间”是即使能付出票价的中国人，也不能乘坐的。船一驶进黄浦江口，江面上停满了外国的商轮兵舰。码头上有我们的同胞，汗流浹背地在外国监工的鞭撻之下，替帝国主义者扛运着他们从中国榨走的宝贵的财富。在上海，有各国的租界，满街上都是外国的商行、工厂、银行、俱乐部……还有跑马厅和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牌子的公园！街道的名字，也根本不是中国的，什么“霞飞路”、“慕尔鸣路”……纵横交错。马路上坐车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开车拉车的却是我们的同胞。两年以后，我们全家又经上海到天津去，天津也和上海一样，割裂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租界里的警察，对待中国人民，简直是犬马不如。我们从天津到达北京，一出火车站，首先经过东交民巷，又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使馆区”！在使馆区的东边，就是现在的东单公园，那时是各使馆驻兵的操场，穿着各种各色军服的外国兵士，耀武扬威地在目眦欲裂的中国人面前眼下，做着兵操……，十二岁的

我，觉得还没走出国门，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已经是到处抬不起头来了！以后的 1915 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向正想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那时我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们贝满中学的同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交爱国捐。那天，公园里社稷坛周围真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悲壮伟大的场面。回到家去，正看见父亲在书房的墙上，挂上一张用岳飞的字排印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的白纸，我们在这张纪念国耻的白纸下，紧紧地握着手，忍住悲愤的眼泪。以后就是 1919 年的 5 月 4 日，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把青岛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再以后又是 1931 年的“九一八”和 1937 年的“七七事变”……。那些年，中国人民受压迫欺凌的日子，真是说也说不完。几亿的中国人民，都有他们自己惨痛的经历，我在过去曾写过一首《因为我们还年轻》的诗中，有一节说：

我年轻时候就没有年轻过！
那时，围绕着我的是：
连天的帝国主义的烽火，
遍地的封建主义的妖魔，
白骨堆成山，血泪洒成河；

国耻纪念比节日还多，
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中国！

就描写了我在那时代的抑郁心境。大学毕业以后，我到美国留学。回国执教十年以后，我又出国游历。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游客”，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坐在头等船舱或头等车厢里，一个陌生的欧美人或日本人，走过来欠身地问：“您从日本的什么地方来？”的时候，我虽然也很客气地回答：“对不起，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时候，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坐头等船舱或头等车厢呢？

中国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作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几亿人民百十年来的冤愤，化成一股翻山倒海的力量，我们终于端起了这座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发出了震天的巨响！这巨响，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三十五年前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中传达出来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百十年来的血泪斗争的沉痛经验中，说出了这句充满真理和智慧的话。我们从心底知道只有劳动人民自己

的党，才能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根本地、彻底地、全面地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远伸深入的吸血管连根拔掉，把帝国主义在我们大地上造成的创痕，洗涤得毫无痕迹！

中国解放了，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中国人，我扬眉吐气了。我自豪，但没有骄傲，我知道这“人以平等待我”的待遇，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替我争来的，我由扬眉吐气，渐转为心平气和，我要坚定积极地和“以平等待我”的各国人民，在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这一伟大事业上，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从五十年代初期，参加了学习和工作以后，曾以作家的身份、和平工作者的身份和母亲的身份，出国访问过十几次。我多次到过父亲从前去过的国家：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我并不曾感到抬不起头来！我要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现在还没有抬起头来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1984 年 8 月 1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红旗》1984 年第 16 期。）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 创作经过

1984 年，国庆 35 周年前夕，《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同志约我写国庆感言。

当时，涌上我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最感痛快的是，压在中国几亿人民头上最大的一座大山——帝国主义彻底崩塌了！

我是本世纪的同龄人，走过了 80 多年漫长的生命道路，跨过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的一年。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又听到作为海军学校校长的父亲给我讲祖国美丽的港湾被侵略者占领，讲他亲自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讲割地赔款，讲中国人到外国抬不起头来的境遇……

我从十几岁起，就在海上、在港口、在上海和天津等地，亲眼看到耀武扬威的外国人和犬马不如的同胞，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啊！以后，我又经历了日

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经历了“五四”运动，经历了“九一八”和“七七”事变……

大学毕业后，我曾到美国留学；以后又出国游历，所到之处，我这个中国人老是受人歧视。那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铲除了帝国主义这座大山。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想到这些，我一口气写下了这篇感言。

（本篇最初收入《作家谈中学语文课文续编》，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初版。）

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

我是含着激动欢喜的眼泪，在周围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离开电视机前走到书桌旁边，奋笔来写这篇短文的！

中国女子排球队，荣获了奥运会金牌，赢得了连获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世界冠军。这个“三连冠”是艰苦卓绝的团结奋斗的成果。

记得在中国女排首次赢得世界杯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祝贺的短文，里面引用了我写过的一首诗：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 “繁星” 五五一

我忘记了在一九二一年是为哪一个成功的人或哪一件成功的事，而写这首诗的，然而无论是哪个人或哪件事的成功的明艳程度，都不如今天中国女排的“三连冠”那样地光彩照人，不可逼视！

我想起也就是和写这首诗差不多的年代吧，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习时参加了女校的篮球队。有一次，我们的体育教员——美国人——带我们到通县去，和美国学校的女篮球队比赛。在火车上，那位美国女教员，还在闭目默祷，为我们祈求胜利，但是上帝也帮不了这个忙！那天我们穿的是制服——竹布上衣、青裙子；在球场上的美国对手穿的都是紧身上衣和短裤，而且在身高、球艺和身体素质上都远远地超过我们。那次输了多少球，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败北”之恨却很久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中国解放了，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人民都翻了身。毛主席说：“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又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十五过程中，中国的女青年们在体育训练上也得到了真正的平等。中国女排就是被发掘的伟大资源中的一支无坚不摧的方面军！是她们首先冲出亚洲走向世

界，成功地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不止。

八月四日中午，我在电视机前心摇目夺地看了中国女排以一比三负于美国队，当时我并没有失望。因为我深知我们的钢铁长城般的女排，在指挥若定的袁伟民教练的指导之下，必定会总结经验，出奇制胜，团结一心，勇敢进击。果然在八月六日下午，中国女排以三比零胜了日本队。今天又以三比零胜了美国队，而荣获了“三连冠”。

爆竹的繁密声响仍在继续，不但近处有，远处也有。我知道这声响不但充满了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而且遍及世界上、一切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守在电视机前为这胜利而流下激动欢喜的热泪的，也不止我国疆土上的十亿人民，而且有五洲四海的炎黄子孙。他们必将和祖国的、在各条战线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同胞们一起，以女排荣获“三连冠”的勇敢进击的精神来鼓舞自己，同心协力，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不止！

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爆竹声中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政协报》1984年8月29日。）

天南地北的花

我从小爱花，因为院里、屋里、案头经常有花，但是我从来没有侍弄过花！对于花的美的享受，我从来就是一个“不劳而获”者。

我的父亲，业余只喜欢种花，无论住到哪里，庭院里一定要开辟一个花畦。我刚懂事时，记得父亲在烟台海军学校职工宿舍院里，就开辟几个花坛，花坛中间种的是果木树，有桃、李、杏、梨、苹果、花红等。春天来了，这些果树就一批一批地开起灿若云锦的花。在果树周围还种有江西腊，秋天就有各种颜色的菊花。到了冬天，就什么花也没有了。辛亥革命那年，全家回到福州去，季节已是初冬，却是绿意迎人，祖父的花园里，还开着海棠花！春天来到，我第一次看到了莲花和兰花。莲花是种在一口一口的大缸里，莲叶田田，莲花都是红色的，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和四蒂的，也不知道祖父是怎样侍弄出来的？兰花还最娇贵，一盆一盆地摆在一条长凳上，凳子的四条

腿下各垫着一个盛满水的小盘子，为的是防止蚂蚁爬上去吃花露。兰花的肥料，是很臭的黑豆水，剪兰花必须用竹剪子，对于这些，祖父都不怕臭也很耐烦！祖父一辈子爱花，我看他一进花园，就卷起袖子，撩起长衫，拿起花铲或花锄，蹲下去松土、除虫、施肥，又站起拿起喷壶，来回浇灌。那动作神情，和父亲一模一样，应该说父亲的动作神情和祖父一模一样！我曾看见过他的老友送给他的一首回文诗，是：

最高华独羨君家，
独羨君家爱种花；
家爱种花都似画，
花都似画最高华。

画出来便是这样的：

	最	高	
	画		华
似			独
都			羨
花			君
种			家
	爱		

我记得为了祖父汲水方便，父亲还请了打井师傅在花园里掘了一口井。打井时我们都在旁边看着。掘到深处，那位老师傅只和父亲坐在井边吸着水烟袋，一边闲谈。那个小伙子徒弟在井下一锄一锄地掘着，那口井不浅，井里面一定很凉，他却很高兴地不停唱着民间小调。我记得他唱“腊梅姐呵腊梅姐！落井凄凉呵，腊梅姐。”——“落井”是福州方言“下井”的意思——那位老师傅似怜似惜地笑着摇头，对父亲说：“到底是后生仔，年轻呵！”

一年后到了北京，父亲又在很小的寓所院子里，挖了花坛，种了美人蕉、江西腊之类很一般的花。后来这个花的园地，一直延伸到大门外去。他在门外的大院里、我们的家门口种着蜀葵、野茉莉等等更是平凡的花，还立起一个秋千架。虽然也有一道篱笆，而到这大院里来放风筝、抖空竹、练自行车的小孩子们，还都来看花、打秋千，和我的弟弟们一块儿玩耍。

二十年代初，我入了协和女子大学，一进校门，便看见大礼堂门前两廊下开满了大红的玫瑰花，这是玫瑰花第一次打进了我的眼帘！我很奇怪我的祖父和父亲为什么都没有种过玫瑰？从那时起我觉得在百花之中，我最喜欢的是玫瑰花，她不但有清淡的香气，明艳的颜色，而且还有自卫的尖硬的刺！

三十年代初，我有自己的家了。我在院子里种上丁香、迎春和珍珠梅，搭了一个藤萝花架，又在廊前种上两行白玫瑰花。但是我还是没有去侍弄她们！因为文藻的母亲——我的婆母，她也十分爱花，又闲着没事，便把整天的光阴都消磨在这小院里，她还体谅我怕殢人的花香，如金银花、丁香花、夜来香、白玉兰之类，于是在剪花插花的时候，她也只挑些香气清淡的或有色无香的花，如玫瑰花、迎春花之类。这就使我想起从前我的父亲只在我的屋里放上一盆桂花或水仙，而给桂花浇水或替水仙洗根，还是他的工作——至于兰花，是离开福州之后，我就无福享受这“王者之香”了。

四十年代初，我住在四川的歌乐山。我的那座土房子，既没有围墙，周围也没有一块平地，那时只能在山坡上种上些佐餐的瓜菜。然而山上却有各种颜色的野杜鹃花，在山中散步时，随手折了些来，我的案头仍旧是五彩缤纷。这是大自然的赐予，这是天公侍弄的花！

五十年代直到现在，我住的都是学校宿舍，又在楼上，没有属于我的园地；但幸运也因之而来！这座大楼里有几位年轻的朋友，都在自己屋前篱内种上我最喜爱的玫瑰花。他们看到我总在他们篱外流连忘返，便心领神会地在每天清早浇花之后，给我送几

朵凝香带露的玫瑰花来，使得我的窗台和书桌上，经常有香花供养着。

八十年代初，我四次住进了医院，这些年轻人还把花送到医院里。如今呢，他们大展鸿图，创办了“东方玫瑰花公司”，每星期一定给我送两次花来，虽然我要求他们公事公办，他们还只让我付出极少的象征性的买花钱。我看我这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帽子，是永远也摘不掉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旅游》1984 年 12 月第 6 期。）

今 日 上 海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在《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这篇短文里，已经评述过：在解放前我是如何地怕到这座殖民地的、藏污纳垢的城市——上海！在那里，中国人是三等公民，连印度巡捕都要高出一头！解放后，我在南下北上之间，经过多少次人民的、安静、整洁、庄严的上海。正如一位外国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

一九八〇年初夏，我到日本访问归来，中途在上海停留了一两天，只见了几位朋友，并没有游览市容。当年秋天，我就病倒了，不用说到上海去，就是家门，也轻易不出了；但即使我自己不到上海，只从我在家里接待的从上海来的亲友口里，我已深深地体会到：今日的海，已经从三十五年前的“冒险家的乐园”，转变成“人民的乐园”了！

今年夏天，有一位当中学教师的年轻亲戚从上海来北京观光，住在我们家里。她在北京玩了十天，

临走前我问：“北京名胜都看到了吧？王府井去过没有？要不要带点东西回去？”她笑说：“名胜古迹都瞻仰过了，真伟大，真美，王府井我不准备去了，我们上海什么都有。”我感到她提到“我们上海”的时候，有一种满足之情，有一种自豪感。

过不几天，又有一位年轻的亲戚来北京作新婚旅行，离京前一天，同她的小女婿来探望我。这位从未谋面的、在上海长大的福建姑娘对我说：“我们应该给您带些上海的精致糕点来，只因不知道几时才能见到您。所以只能送您一点北京的葡萄和桃子。”正好在我客厅桌子上有一朋友刚送来的“宫廷糕点”，我把盒子递给她，也笑着说：“这盒糕点回敬你们了，你也尝一尝北京粗糙的糕点的滋味！”她的小爱人笑着飞了她一眼，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都是家庭生活中很琐小的趣事，但是“从小见大”，说明上海人对于他们居住生长的地方是十分满意的，至少在吃的、用的方面，什么都有，都好，都方便。他们由“安居”而“乐业”，也加倍起劲地做自己岗位上的工作。

这“什么都有”，要归功于上海的工人阶级，当然也包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上海，工厂企业里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不

但方便了上海的人民，而且还远销到中国其他城市和外国的地区、城市……这些成绩我是说不清的，还是让上海人民自己来说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84年10月14日。）

致 谢 为 楫

楫弟：

你给我们祝寿的信前已转给二哥。二哥在我生日那天，又带一个大糕来，切糕时曾照一相，因是陈恕照的，他要到“爱尔兰”去进修，为期一年，后天就走，相盒他带走，恐怕要等在那边洗后才寄来。朱铁臻有电话，说调素梅事已在办，成功后请告我，我们都如恒。祝好！

姐 姐

九、十三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桥

飞机渐渐地飞进了云层，往下看时，连祖国的整齐葱绿的田野，和蜿蜒闪烁的细细的河流都看不见了，琳达忽然感到此时的她，又像是自己在许多年前写过的短诗里所说的：

.....

恨就在
手摸不着天
脚也不常踩着地

刚刚过去的三个星期，在姑妈家里过的生活，使她活泼了许多，舒畅了许多，闲适了许多，总的说来，就像关在鱼缸里的小鱼，忽然又回到了清澈的溪水里似的！

她离开祖国四十年了，那时她才十岁，先跟父母到了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她在美国受的高等教

育，和一个在菲律宾生长的华人——刘大伟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安娜。大伟是一所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女儿也受着很好的教育。她在家里尽量说“国语”，也教女儿一些中国的古典诗文，可以说是一个很美满的美籍华人的家庭。但是自从七年前母亲逝世以后，她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在大海上飘荡的孤舟，着不到边际。正是温柔娴静、爱好文学的母亲，使她深深地沉浸在祖国的优美文学的心灵环境里。三十六年前，她的父母和她的姑妈、姑爹一道都在台湾教书，他们同时得到美国大学的聘函，姑妈和姑爹毅然回到了祖国，她的父亲最后选择了到美国的道路！不会英语的母亲在异国异乡，常常感到无限的寂寞，又不惯和那些居留在美国的中国太太们打桥牌和麻将，也不会和她们无尽无休地议论着家长里短，她在家务劳动之余，就是拿起中国的诗词小说来吟哦诵读。这时琳达就紧紧地挨在母亲身边，听她吟诵，听她述说着对祖国故都和江南风物的描写和怀念。她觉得母亲在她心里，就是一个抽象的祖国！母亲还鼓励她写诗，并把她写的小诗，工整地抄在小本上。母亲死了，父亲从台湾得来的关于祖国的消息，都说的是在中共虐政淫威之下，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琳达一想到母亲所热爱的、怀念的祖国，总会忆起旧诗词里的：

.....

昨夜东风里
忍回首月明故国
凄凉到此

或是：

思往事、愁如织
怀故国、空陈迹
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

她忧伤，她抑郁，还感到在她的人格的另一面，除了不会英语的母亲之外，都没有人和她有心底的共同的语言。她也只有把积压在心底的话写成一首一首的短诗，来纪念逝去的人，逝去的岁月，逝去的梦。

八十年代初期，大伟和安娜在暑期里参加了一个到中国去的旅行团，琳达不敢和他们同去，她怕看到凋敝的故国。大伟父女回来时，她又急不可待地问着他们的观感。大伟说大陆并不像台湾说的那样可怕可怜。他去到他从未去过的父母的故乡——广东梅县，农民富裕得很，许多家还盖起了三层楼房。大陆到处都看不到讨饭的人，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

是衣着整齐，匆忙而喜悦地工作着。安娜也说大陆很美，北京的宫殿真雄伟，桂林的山水真奇秀，这些都是美国所没有的。但是琳达却觉得他们谈起中国来，口口声声是“大陆，大陆”，缺少一种亲切之感。在安娜眼里，大陆的万里长城和罗马的斗兽场，同样地古老雄伟，北京的天坛也和巴黎的铁塔一样的庄严挺拔，没有“亲、疏”之别，不像她母亲谈起这些古迹时那样地低回，那样地依恋，那样“我自己的国家”的神情，琳达觉得有些怅惘。

但是大伟和安娜却带来了姑妈用毛笔在仿古信笺上给她写的一张短简：

亲爱的琳达：

见到了大伟和安娜，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安娜长得真像你，不过比小时的你更活泼一些。这次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来呢？明年你一定来探亲，就住在我这里，我和你姑爹都十分想念你。

爱你的姑妈 即日

原来大伟和安娜在参观一所大学校园的时候，无意中问起两位老教授的名字——本来他们以为两位教授在十年动乱中，已经不在人世了——意外地

听说这两位老人都还健在，虽然已经退休了，却仍住在校园里，安娜说他们去拜访时，两位老人十分高兴，招待他们吃了北京的糕点，因为夜里大伟父女俩还要去听京戏，没能留下吃晚饭。看着老人都很健康，住得也很舒适，满屋的书架，满院子的花！

于是，在今年夏天琳达就回国来过了三个星期的快乐的探亲假。

姑妈没有孩子，可是家里十分热闹，总是有人来访，不是他们的学生，就是他们学生的学生。客人称姑妈为陆老，称姑爹为耿老。对着客人，姑妈总是搂着她的肩膀，亲昵地向她的学生介绍说：“这是陆琳达，我的侄女，从美国回来探望我们的。”于是，这些中、青年人就十分热情地过来同她谈话，还夸她的普通话说得地道，不像是一个久居在外国的人。姑妈还请她的学生们带她去看一些新鲜的事物，说：“你一定会常回来的，名胜古迹是常存不变的，不过每年会修缮得更完整美好一些，还是去看看一些新的工厂、农村、个体专业户吧，可以对照出祖国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情况。”于是琳达在同他们一同参观访问的时候，总仔细写下一些笔记，同时她也小心地问了一些她认为不能问的话，比如：十年动乱中，她姑妈姑爹到底受了折磨没有，“文化大革命”还会不会重来？她惊奇地发现这些答话的人都十分自然、乐观而

坦率。他们说，她姑妈和姑爹也和其他的老知识分子一样，挨了批斗，住了牛棚，下了干校，但他们一直都很稳静，很乐观，认为这一切违背了正常的人情物理的事，党和人民不会容忍的，必然很快就会消灭，他们也就这样地挺过来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决不会再重复了，因为中国人民受的“文化大革命”的苦太重太深了，他们正在展翅起飞，决不会让这个妖魔再绑住翅膀。这些谈话和同年轻人一起的游览，都使她对祖国更加了解和喜爱。但是她以为最惬意的还是同姑妈姑爹在家里闲谈的时光。姑妈常常提到母亲同父亲的结合，正是她给牵的线。因为她同母亲是最知心的同学。谈起她母亲在美国时的寂寞和抑郁，姑妈就有些激动，说：“当初你们要和我们一同回国就好了，你父亲也太……”这时姑爹就轻轻地拍着姑妈的手背，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了，还说它做什么？琳琳，你今天打算到哪里去玩？”谈这些旧话的时候，大半在早晨，大家吃着早饭：面包、鸡蛋和稀粥、酱菜，一吃就是大半个钟头，比起琳达自己在美国家里，匆忙地喝过一杯咖啡，就开车走上高速公路，去赶上图书馆的早班，要悠闲得多了。晚上呢，姑妈家的老阿姨会给她做出种种在国外永远也吃不到的好菜。没有客人的时候，姑妈又和她谈着许许多多她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把她送上床，盖上毛

巾被，在她脸上亲一下，轻轻地掩上门出去。这时她总想起母亲，想起：

.....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又想起自己曾写过的短诗“等望”的末一节

.....

我饮尽青天和夕阳的光彩
和草儿一样
不复感到孤单

飞机上的回想仍在继续，一只扶上她的肩膀的手，把她从沉思默忆中惊醒过来，睁眼看时，原来是一个黄发蓝睛的中年妇女，她笑着说：“刘太太，您也到中国旅行来了！”这个很眼熟的女人，大概是常到图书馆来找中国资料的，但是记不起姓名了，琳达就也笑着说：“我是来探亲的，您在中国玩得还好吗？”这时，这个“什么太太”又已经回头去和别人说话了。

飞机不知何时又钻出了云层，往下看时，是碧波粼粼的大海，是把中国和美国间隔开来的太平洋吧？

刚才一声“刘太太”，把她又唤回到太平洋的另一边，她居住了三十年的“家”！

琳达捏着手里微温的、浸透了两个小时以前离开姑妈时流下的热泪的手绢，坚强的姑妈居然也哭了，没有说出一句话。倒是姑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不是一个两头够不着的边缘人，你是一座桥，两头的桥脚都踏在很坚实的土地上，你要让桥两边的人们，不断地往来在这座桥上，交流着两国的文化和感情……”这几句话在琳达耳边鸣钟般地震响着！

琳达忽然不再难过了，她抻了抻衣服，挺起胸来坐直了，“我是一座桥！”她低低地对自己说。

1984 年 9 月 16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妇女报》1984 年 10 月 30 日。）

愿中国妇女实现更多“零的突破”

我在最近写的一首词《浣溪沙·今日北京》中写道：“卅五年前忆北京，独夫为重万民轻，乱鸦斜日又荒烟。今日北京春色满，百花齐放鸟争鸣，诗人兴会更无前。”今天不但在北京，在全国的文艺百花园中，开出了多少鲜艳的奇葩；在文艺工作者的队伍中，涌现出多少新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茁壮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她们中年纪最轻的只有十几岁。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但是今天的青年女作家们是比我们成熟多了。不但是女作家，还有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妇女，比如，在体育界，中国女排就首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充分显示了中国妇女是建设四化的一支无坚不摧的方面军。我祝愿着，期待着，有更多的女作家、女诗人、女翻译家……以女排的勇敢进击精神，为祖国去实

现更多的“零的突破”。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84 年 9 月 30 日。）

《葛翠琳幼儿文学选》^① 序

葛翠琳同志把她这些年来为各报刊写的儿童故事集成一百篇，让我做序。我很高兴而又惭愧。

我觉得女作家里面只有葛翠琳同志是一直为儿童写作的，我相信她会写一辈子！这一点我就没有做到。

为什么她能够这样坚持？因为她除了热爱儿童之外，还深入儿童生活，参加他们的种种活动，熟悉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她写给儿童看的东西，都是充满了乐观、向上、健康的情绪，使人读了有一种暖烘烘、喜盈盈、红彤彤的感觉；得到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那样的教育。

可惜的我现在身边没有幼儿，近年来我又行动不便，又不能出去找幼儿向他们诵读。我愿我国的母亲们和幼儿园的老师都能得到这一本书。我认为

^① 《葛翠琳幼儿文学选》，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会使你们和幼儿们同在的光阴，丰富而又甜蜜！

一九八四年国庆节

致 陈 恕^①

亲爱的陈恕：

你走后不但吴青想你，我们大家也都想你，尤其是 Daddie，他昨天已进北京医院检查，我让吴青送他去的。昨夜是哥哥找的那个周师父去陪他，他还是喜欢小张。我今早已写信找小张了，小张正在补习，准备考招工（本月十五号止），不知他能来否？反正他进医院，大家就放了心，一、三、五日大家轮流去看，情况随时报告。家里都好，姐姐到洛阳和西安出差，二十二三号回来，哥哥他们也都好。大姐很好，大姐夫有信来也很好，家中一切你闭眼都能想到。你此时想已上学，功课怎样？满意吗？居住饮食已习惯否？反正多呆一天，离家就近一天。你走时怎么忘了带茶叶，最近又有人送来。咪咪现在就在我旁边，不知你想它没有？它现在越来越娇了。吴青仍是每天下午去

^① 陈恕，冰心的二女婿。1984 年至 1985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蹭它。北京天气已凉，但真晴爽。我最不喜欢英国那种阴雨天气，但草木是绿的。时时去北京医院，看见国庆后，北京街道绿化得真好看！

匆此，赶赴早邮，望多保重！

娘

十、六晨

欢呼《民进妇女》出刊

民进中央妇女委员会，出刊《民进妇女》，要我
为刊头题字。虽然我的字很难看，不能登大雅之堂，
但我也欣然答应了。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是教育工作者，也有一部分是文艺、科技、医卫工作者，而妇女会员约占会员全数的五分之二。妇女会员们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热爱自己的岗位工作和民进会务的工作。《民进妇女》的刊行，可以使全国的妇女会员有个增进团结、加强学习、交流经验、互通消息的广大园地。希望全体妇女会员都充分地来利用它！

1984年10月9日

（本篇刊于《民进妇女》1984年11月25日第1期。）

致 巴 金

老弟：

得你亲笔信，非常欣慰！香港大学有我的小朋友（马铎先生之子）马蒙、马临（大学校长）等；中文大学有我的学生郑德坤（研究教授）、黄文宗夫妇等，请小林都替我问好，也说我请他们分外照应你。你去了万无一失，你是名人，又是海外、国内人人景仰的大作家，那能比日本人照应得还差呢？小林信写的还详细，我也饶恕她了，并且亲她一口，她的确是个好孩子，希望堂堂的小女儿大了也像她。希望此信在你离沪之前收到。祝好一路平安！

大 姐

十、十二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信拜读，《周立波文集》不日定可到，不另复。“三集”迟迟未出，许多朋友都来信问到。我知道出版社一定有问题，作者编者都无可奈何！不是您的过错，请不要难过！近体如常，不参加社会活动后，休养得好些，不过仍有“不速之客”，一点正经事都作不了，奈何？祝

安好

冰 心

十、廿一

美的北京街头

窗外是金灿灿的秋天。天空是湛蓝湛蓝的。射进窗内的秋阳暖烘烘地笼盖在书桌上，在写字的手上。案头瓶里的红的和白的玫瑰花，新换过水，送出一阵一阵的幽香！而不堪放眼的却是我窗外楼前的一大片建筑工地：地上堆着煤屑，铺满了煤渣，煤渣上面横放着许许多多的生锈的钢条。丛生的青草顽强地从一行行的钢条中间，探出头来，在微风中摇曳着开始发黄的、自豪的长长的叶子。在那两座高楼完工之前，我窗前这片大地是不会绿化的。我不如这些顽强的小草，在这枯燥的天地里自力更生！

我病后有四年足不出户了，这对于本来好动的我，是个极大的痛苦。我唯一出门的机会，就是每月一次到医院去的“检查”，这时，我就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观察着车窗外的一切。

十月五日，是我照例到医院“检查”的日子。

我的车子一开出校门，就看见大门两侧堆起了

两个花坛，几百盆盛开的鲜花，黄的、白的、红的，一圈一圈地整齐排列着，外围是一圈的“一串红”。这片明艳的花团锦簇，猝然地扑入了我的眼帘，使我惊奇而喜悦。

车走过紫竹院公园，公园门口排列的盆花，也比往常的更多、更美，范围也更大了。马路两旁的整齐高大的钻天杨，在繁花衬托之下，似乎也更翠绿、滋润了。车子顺着迎宾馆路直驶下去，在绿树和松墙夹起的草地上，点缀着鲜红的玫瑰和美人蕉，迎宾馆大门两侧的花坛，不用说，更是别致而光彩！

到长安街西头的转折处，矗立着一只松枝修剪成的大花篮，上面插满了很大很美的花。顺着长安街一路往东走，我喜悦的心潮渐渐上涨，不但各个大厦、各个公园、各个机关、各个旅馆的门口都争妍斗奇地、排有两个新颖别致的花坛，而且马路两旁的每一棵树下，都有一簇簇的鲜花围绕着。北京城成了花的世界！我在北京，除了解放前在内地和海外的日子以外，也还住了六十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了这般光艳明丽的北京街头！

回想起七十年前，我初到北京时节，看到的是“尘土飞扬的街道，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在美国，抑郁地慨叹说，“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今天，这一切都恶梦般地消失

了。

美的北京街头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明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对于美的、艺术的要求就喷溢而出。人民的心情舒畅了，他们不会满足于自己案头的花朵，院中的花木，他们还要关心到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他们发挥出人类本身对于美的事物、美的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他们的愿望是纯洁、真挚、善良的。他们要借着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机会，把自己的城市装饰打扮起来。他们把北京街头打扮得多么美好！

北京街头的“美”的巡礼，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我所永不忘却的，一位美学家的话：“美和真、善是分不开的。”

1984 年 10 月 23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5 年 1 月创刊号。）

关于男人（之一）

四十年前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隐居的时候，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一本《关于女人》。我写文章从来只用“冰心”这个名字，而那时却真是出于无奈！一来因为我当时急需稿费；二来是我不愿在那时那地用“冰心”的名字来写文章。当友人向我索稿的时候，我问，“我用假名可不可以？”编辑先生说：“陌生的名字，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说：“那么，我挑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吧。”于是我写了《关于女人》。

我本想写一系列的游戏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还是“游戏”不起来，好歹凑成了一本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我曾说“我只愁活不过六十岁”。那的确是实话。不料晚年欣逢盛世，居然让我活到八十以上！我是应当以有限的光明，来写一本《关于男人》。

病后行动不便，过的又是闭居不出的日子，接触的世事少了，回忆的光阴却又长了起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远在可敬可爱的女人们之上。对于这些人物的回忆，往往引起我含泪的微笑。这里记下的都是真人真事，也许都是凡人小事。（也许会有些伟人大事！）但這些小事、軼事，总使我永志不忘，我愿意把这些軼事自由酣畅地写了出来，只为怡悦自己。但从我作为读者的经验来说，当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怡悦自己的文字，也往往会怡悦读者的。

一 我的祖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

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薰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薰鸭店名。这薰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

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对面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叠好，把后房门带上出来。这事我们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说，而祖父也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们这件越轨的举动。

祖父最恨赌博，即使是岁时节庆，我们家也从来听不见搓麻将、掷骰子的声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们一家最热闹的日子了，客人来了，拜过寿后，只吃碗寿面。至亲好友，就又坐着谈话，等着晚上的寿席，但是有麻将癖的客人，往往吃过寿面就走了，他们不愿意坐谈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气话。

在我们大家庭里，并不是没有麻将牌的。四叔母屋里就有一副很讲究的象牙麻将牌。我记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亲奉召离家的时候，我因为要读完女子师范的第二个学期，便暂留了下来，母亲怕我们家里的人会娇惯我，便把我寄居在外婆家。但是祖父常常会让我的奶娘（那时她在祖父那里做短工）去叫我。她说，“莹官，你爷爷让你回去吃龙眼。他留给你吃的那一把龙眼，挂在电灯下面的，都烂掉得差

不多了！”那时正好我的三堂兄良官，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从兵舰上回家探亲，我就和他还有二伯母屋里的四堂兄枢官，以及三姐，在夜里九点祖父睡下之后，由我出面向四叔母要出那副麻将牌来，在西院的后厅打了起来。打着打着，我忽然拚够了好几副对子，和了一副“对对和”！我高兴得拍案叫了起来。这时四叔母从她的后房急急地走了出来，低声的喝道：“你们胆子比天还大！四妹，别以为爷爷宠你，让他听见了，不但从此不疼你了，连我也有了不是，快快收起来吧！”我们吓得喏喏连声，赶紧把牌收到盒子里送了回去。这些事，现在一想起来就很内疚，我不是祖父想象里的那个乖孩子，离了他的眼，我就是个既淘气又不守法的“小家伙”。

二 我的父亲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以“威”字命名的

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 1914—1915 年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五十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

×××××××

×××××××

东沟决战甘前敌
威海逃生岂惜身
人到穷时方见节
岁当寒后始回春
而今乐得英才育
坐护皋比士气伸

第二首说的都是谢家的典故，没什么意思，但是最后两句，点出了父亲的年龄：

乌衣门第旧冠裳
想见阶前玉树芳

希逸有才工月赋
惠连入梦忆池塘
出为霖雨东山望
坐对棋枰别墅光
莫道假年方学易
平时诗礼已闻亢

从第一首诗里看来，父亲所在的那艘兵舰是在大东沟“决战”的，而父亲是在威海卫泅水“逃生”的。

提到张心如伯伯，我还看到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是父亲在烟台当海军学校校长的时期（父亲书房里有一个书橱，中间有两个抽屉，右边那个，珍藏着许多朋友的书信诗词，父亲从来不允许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说父亲如今安下家来，生活安定了，母亲不会再有：“会少离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间有几句说：“秋分白露，佳话十年，会心不远，当笑存之。”我就去问父亲：“这佳话十年，是什么佳话？”父亲和母亲都笑了，说：那时心如伯伯和父亲在同一艘兵舰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单调，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抢来看。当时的军官家属，会亲笔写信的不多，母亲的信总会引起父亲同伴的特别注意。有一次母亲信中提到“天气”的时候，引用了

民间谚语：“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着逗着父亲说：“你的夫人想你了，这分明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的意思！”父亲也只好红着脸把信抢了回去。从张伯伯的这封信里也可以想见当年长期在海上服务的青年军官们互相嘲谑的活泼气氛。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晓发××尚未寒
夜过荥泽觉衣单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民初，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1期。）

悼念有吉佐和子

我案头的日历，左边已翻过了一大摞，右边只剩薄薄的几张纸。窗外朔风呼啸，又是“急景凋年”时节。去年年终，我在写的怀念日本朋友的短文中，还曾提到有吉佐和子。怎能料到今年此日，她已成了古人了！

我和她的初次会面，是在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到了东京。日本朋友在椿山庄设宴招待我们。致欢迎词的就是有吉佐和子。那时她风华正茂，穿着一身淡素的衣裳，更显得她双颊红润，身材丰硕。她会英语，我们可以直接交谈。她知道我到过广岛，特地在风雨交加之日，到我们住的镰仓旅馆来看我。我们谈得很深。当我谈到我和年轻的原子弹受害者的谈话时，她忍不住哭了，我也很激动，当时就做了一首词送她，调寄“卖花声”：

忆我访扶桑

椿树山庄
欢迎会上互飞觞
淡素衣裳灯彩里
玉润珠光

何事最难忘
热血柔肠
纵谈广岛泪双行
者是论交开始地
春雨镰仓

当年秋天，她来华访问，就带来一把泥金摺扇，让我把这首词写了上去。

我和她相熟，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时她带了女儿和一个保姆，来华休养，住在城内和平宾馆的中国式小院子里，廖公吩咐我好好地照应她。因此我常从西郊进城，有时陪她到医院看病。她年轻，住不惯清静的病室，往往在我和医生说好安顿她住院之后，过不了三天，当我从城外带了花束去看她时，她却已经出院，回到宾馆去了！

有吉佐和子是个才华横溢，而又多产的作家。她曾告诉我，她能同时为三种报刊写三种长篇连载！她又极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她从不吟风弄月。她在留

美期间，看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她十分愤怒，写了《非色》。她同情老年妇女的悲惨的遭遇，写了《恍惚的人》。她对于因工业现代化而引起的污染问题，尤为愤慨，写了《复合污染》。她写了许多这类的小说和文章。虽然我看不懂日文，每出一本书，她必定送我一本。

她来华不止一次，这期间我也多次访问日本，我们不断地会面，每次会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最后的一次访日，是在一九八〇年春夏之交，我和她又晤谈了多次。我访问了她的新居和摆满书籍的书房，会见了她的母亲和长大了的女儿。当我在今年九月初，得到她突然逝世的消息时，我惊诧而又悲痛，我万万没有想到像她这样年轻、前途无量的作家，会比我这个老人，先走了一步！

有吉佐和子是廖公发现的一位人物，他珍重地把她介绍给我。如今廖公也不在我们中间了！一衣带水的两岸，少了这么两位热情、爽朗、才气纵横的人物，叫人怎能不感到寂寞呢？

甲子立冬

致 陈 恕

亲爱的陈恕：

前读到你的未封来信和附来相片，十分高兴。你在青岛照的，陈钢已寄到青岛去了。你近来想已渐渐习惯，但饮食仍不要太省。我认为你不必给吴青他们买衣服，他们的衣服有的是，你宁可自己多吃一点，养养身体。Daddy 在医院，现在白天黑夜都有人看护，他也日有进步，在院住着，正好度过家里没有暖气的日子（医院里早已有了）。今天吴青生日，午餐吃面，晚上再吃蛋糕。哥哥到深圳，去了十来天，昨晚才回来，我们还未见面。姐姐一家都好。我还可以，就是忙于对付文债，你千万自己保重！

娘

十一、九

忆 烟 台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

但是，关于烟台，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童年时代的烟台，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地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它不会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它的一角海滩上，徘徊踟蹰，度过了潮涨潮落的八个年头。

从烟台来的朋友告诉我，东山海军学校的旧址上已经盖上了很豪华的宾馆，她还邀请我回去小住。我的想象力太差了，竟不敢在我的、荒凉的海滩上，建起七宝庄严的楼阁！

我是一九一一年离开烟台东山的，一九一七年曾回去一次，这中间变化不大。等到我一九三五年再去时，东山的海军学校里已驻了军队，我只能从墙外

看到那间高出墙头的、黯旧的小楼。这时我还注意到从山上卡子门到东山海校的路上，这一片土地，是属于金钩寨的。两旁田地中丛冢的墓碑上，刻有许多“贞女”“节妇”的字样。我猛忆起我小时书斋墙外就有田地中的丛冢，往往听到墓边有妇女哭“老爷”的悲切的声音，那都是受了委屈的寡妇来发泄她满腔的凄楚悲凉的！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童年的我还不能体会到。

村北的海军练营、村南的海军学校，都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中间的金钩寨这个村落，一定还在山陬海隅安息着。这个我所熟悉的、一想起就感到亲切的、百十来幢偎倚着的村舍，里面生活着、劳动着我的淳朴勇敢的乡亲。他们如今一定和全国的农民一样，进步而富裕起来了。请你们接受我从千里外送去的祝福！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旅行家》1985年第3期。）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前几天得你亲笔信和两张照片，那张单人的，真神气！西装笔挺地，那张同小林和小棠的也好，是个幸福的父亲。小棠，我第一次——不论是相片是真人——看见，我觉得他很像萧珊。昨夜吴泰昌打电话来，说你有东西送我，他星期四拎来，到那时再告诉你吧。北京今天下雪，我心里高兴，前几天连阴，闹得我什么事都不想做！我最怕连阴天，仿佛连气都喘不过来。知道天公是在酿雪，我也就原谅他了。小林这孩子如今也不给我写信了。你手抖写不了长信，有话就应该让她说！我还可以，文藻仍在医院，吴青整天瞎忙，余不一一。请保重！

大 姐

十一，十八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寄家乡小读者

家乡的小朋友：

《小学生周报》发刊了，这对于小朋友们是个极好的消息。

我们的家乡——福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大港口，它每天都在接待着五洲四海的人物，都在传送着五洲四海的信息。我愿福州的小公民们，不放过你们在家庭、学校、社会上所接触的一切新鲜事物，以及这些事物在你们生活中所引起的新的变化，同时利用《小学生周报》这块发表创作的园地，把你们的感情抒写下来，把你们的理想发挥出来，以供同学们切磋观摩和老师们评论改正。这样，对于你们的写作练习，是会有很大的好处的。我很忙，不能多写，祝你们不断进步。

你们热情的朋友 冰 心

1984 年 11 月 20 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学生周报》1985 年 1 月 7 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今年是你八十大寿，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记得吴青曾替你买过人参，兹送上吉林名产一合，请小林每天给你蒸上几片，可以吃好些日子。

祝你

长寿！

吴青拜寿。

大 姐

十一月二十晨

《少年时》序

老舍的女儿舒济给我打个电话，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要出一本新凤霞同志少儿时代事迹的集子《少年时》，凤霞同志想让我写序。当晚凤霞同志自己也从电话里和我谈了，第二天就把她的两本书《艺术生涯》和《新凤霞回忆录》给我送来了。这两本集子里，就有她少儿时代的经历。

这两本书都比较厚，拿起来沉甸甸的！可我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只用一天半的工夫，就把它看完了。其中有几篇是在报刊上已经读过的，还有叶圣陶老人为《艺术生涯》写的序，我已经从《叶圣陶序跋集》里读过了。读完了这两本书，新凤霞这个人就从纸上劲秀挺拔地，出水芙蓉般站在我的面前！

我见过新凤霞，但她不是在台上，我也不在台下，因为我很少听戏。我记得那是一次招待外宾的场

合，在一圈椅子当中，她给我们清唱了一段。对于戏剧我是外行，我只觉得这位演员没有化装，却自然而俊俏，声音也很圆润。

关于她的艺术方面，国内外已有盛誉，我是说不上话了。我要赞美的，是她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出水白莲般的独立自强的人格，这是我们少年儿童学习的好榜样。

新凤霞的这些回忆与随想的短文，写得很好很好！为什么好？因为她写的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艺人社会底层的苦大仇深的生活经历。都是真情实感，有血有泪，有唱有笑。她是为抒写而抒写，就像叶老说的，“畅达”而“深刻”，点缀着一些错别字的字句里，涌溢着她心中甜酸苦辣的感情！

新凤霞是个有主意的女性。她“在旧社会亲眼看到很多女演员嫁人以后的悲惨经过”，所以她很“谨慎”。她说：“对于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学问的，在事业上能对我有帮助的人，而且还得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好人，做我的终身伴侣。”她说到也做到了。对于在挑选终身伴侣上的这个“谨慎”，我看有些女知识分子似乎还没有做到。

凤霞同志还有几句对现在青少年讲的，披肝沥胆、字字沉痛的话：

“我最羡慕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你们多幸福呀！不幸的道路走过来了，惨痛的经验教训由你们的前一代承担了，国家有了希望，前途无限美好，你们今后可能就是在平坦的大路上前进了，只有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祖国称职的建设者——青年时代非常短、非常短，可是它是一生的基础，所以千万要抓住它，不要浪费一分钟……老年人常爱讲‘家贫出孝子’，现在的孩子们不大容易体会这句话了，因为家贫的程度，比起当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孩子们懂事就上学，毕业就分配，生活有了保障，没有吃不饱饭的威胁，和旧社会比起来大大不同了。可是我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街上无聊的打闹……‘四人帮’提倡的那些翻脸不认人，不知道疼人，不懂感情，刻薄残忍、粗暴、无礼、损人利己，什么都是伸手要，没有自己努力创业的精神，甚至赶不上像我们在旧社会，从小就知道一切全要靠自己挣到手，要靠自己学，去奋发努力……。

“亲爱的年轻人，你们是幸福的人，不要浪费时间，抓紧学文化、学科学，担起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为民族争光的重担，创造文明，创造财富。”

我把凤霞同志讲的话抄了下来，因为她讲的比我想讲的话透彻多了。我愿读《少年时》这本集子的青少年们，读过后要好好地记住这些话，这对于你们

的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今晚报》1985 年 1 月 2 日。）

致 巴 金

老巴：

听说王蒙去接你，我正在等着，昨天听说小林有电话，说你感冒不来了，为之怅然！寄去文集三卷和人参一合（托人带去的）想已收到？请小林复我。冬至前后北京很冷，我也感冒发烧，现已全愈，文藻仍在医院，他进院治疗已两月有余，情况还好。小林忙得怎样？你手抖，她也不写信，真不乖！谢谢你的《病中集》。

祝

好！

大 姐

十一、廿七

致 葛 翠 琳

翠琳同志：

得电话，才知道你已从外面回来了。你那本《幼儿故事一百篇》，我已在上月给你写好了序。但打电话有时不通，有时你又不在家。文藻上月 5 日因“帕金森”症，已进北京医院治疗，进展得比较慢，但不要紧，勿挂。我很好，有人来了。勿祝全家安吉

冰 心

11. 30

序寄上，如可用，电话示知，我再把你的文章挂号寄去。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陈 恕

亲爱的陈恕：

从老二那里得到你的消息，说是你已渐惯了，并且认识了一个大夫，我觉得很好。我看你不必太省，主要要吃得好，不必为家里多买东西，西方东西日新月异，可买的东西多得很，但是你钱紧不必买。我还好，老二很忙，一天还不如你在家的时候多！姐姐也忙，哥哥新近调了工作，搞室内装饰，上班很远（十里铺），但他觉得顺心。他刚从北戴河回来，为了业务。Daddy 还在医院，一方面进展得慢，一方面他同时又常感冒，气短等等。在医院里看病方便，可以也不急回来，反正日夜我们都请人看护，一、三、五、七都有家里人去看，送东西。

北京还不太冷，暖气阳光都好。咪咪最近又长了，七斤半，沉甸甸的，又馋。你已经去了三个月，归期又近了。

大姐很好，这次不写了。

娘

十二、二、一九八四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听卓如同志说您的爱人病了，动了手术，现在怎么样？好些吗？甚念！第三卷^①平装二十多本，精装五十本，都已收到，请再给我寄平装三十本，该款从稿费中扣，或再寄去，因为要的人太多了。匆上，即颂
撰安！

冰 心

十二、四日、

^① 指《冰心文集》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再给《小苗》小读者的信

亲爱的《小苗》小读者们：

记得去年年终时节，曾给你们写过一封信。光阴过得多快，又是一年了！这一年中，你们的进步当然比我快多了，而且也应该是这样。

难得你们常常想到我（我想这里面也有你们老师的引导！）我几乎每天都得到小朋友的信——不但有北京的，也有全国各地的：信中除了慰问我以外，还向我报告你们的学习成绩和课外做什么活动等等。这些都使我十分高兴。我虽然不能一一作复，但每封信我都仔细地看过而且珍重地收起。

《小苗》的编辑同志，特别要我向大家说几句勉励的话。我还是真有话想对你们说！积八十多年的经验，我深深感到八十年代的儿童，比像我这样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儿童，不知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你们看得多——比如说通过电视机；你们听得多——比如说通过广播机；你们读得多——比如说有许多书报

刊物。你们的知识不知比我们当年多多少倍。知识就是力量。你们是不是应该把你们的从知识得到的全部力量，用在学习、工作和课外的种种研习上，和我们的欣欣向荣的社会、国家，同步地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呢？我愿你们在和旧岁告辞的时候，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以无限兴奋喜悦的心情祝你们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你们的热情的朋友 冰 心

1984 年 12 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85 年 1 月 13 日。）

介绍一篇好散文

——读叶至诚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文汇月刊》的编辑来了，和我在阳光满室的客厅里谈了半天。我们先谈到散文，关于写和读散文，我们谈了很多。最后他说到了主题，要我在“我喜爱的散文”栏里介绍一篇好散文。这件事说起来仿佛很容易。这些年来我看的散文很多，好的也不少。但要我介绍一篇好散文，又似乎很困难，因为欣赏一篇作品，和欣赏者当时当地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读者的年龄、经历、情绪不同，则对作品的共鸣程度也有深浅之分。同时我近年来因行动不便，又从不外出，看书的时间很多，每天送来的书报刊物又不少，常常过眼云烟一般，留不下太深的印象。我又丧失了剪报的习惯，因为我往年存留的东西，经过几次劫数，又给我留下了几道很深的伤痕！

不过，今天我正在阅读一本《未必佳集》，是叶

至善同志兄妹三人自谦之为“习作选集”的。里面好的文章不少，但是在“至诚之页”中有一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在六十年前写过一首诗，用的也是这一个题目，可是我的意境就比他的狭仄多了！我只是要“我的作品”，能够使人“想起这光景在谁的文章里描写过”，“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在纸上时”，“我就要落下快乐的眼泪了”。至诚同志却要努力地做一件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在作品中有我自己”，他说“我……你……他的作品”，都以“你的灵魂你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就真正的有了百花”。他以为“有我”就是“文如其人”，就是“必须严格地说自己真实的话”，“必须披肝沥胆地去爱、去恨、去歌唱……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地一无保留地交给读者；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献给读者。”这一着真是谈何容易！只有“人到无求”才能这样地勇敢。如今说假话、空话、大话的作家也还不是没有。至诚同志这篇散文得到我心弦上最震响的共鸣！《文汇月刊》的编辑客气地要我为“我喜爱的散文”这个新栏目“剪彩”，我一辈子没剪过彩，从来也不梦想我敢剪彩，但有了至诚同志——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这篇文章，我就毅然地把这“彩”剪了，我从心里愿意给广大青年作

家和读者介绍这篇好散文。

1984 年 12 月 5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月刊》1985 年第 1 期。）

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

我从什么时候和开明书店发生了关系，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只好翻看从前的作品。在北新书局印行的《冰心全集》的序里，有一段说：当时北平坊间出了种种《冰心女士全集》，集选芜杂，序言颠倒，题目变换，封面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里面还加入了许多“冒名”之作……下面有几句话说：

过不多时，几个印行我的作品的书局，如北新、开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

这个序是在一九三二年写的，足见在一九三二年之前，我已有什么集子交给开明印行了。但是我不记得。

在巴金的《冰心著作集》后记里，他说：

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说是她的

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开明书店刊行。

这重编的工作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原先已有了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

在抗战以前，北新是按月给我寄《冰心全集》的稿费的，抗战以后，就没有了。巴金对我那时的经济情况，是十分关怀的。

我自己记得的，是一九四四年，又是通过巴金，把我的《关于女人》交给了开明书店。我在《关于女人》再版自序里说的很清楚：

天地出版社原说是这本书销路很好，出版后不到三个月，便准备再版。我就赶紧将改正本交给他们，此后却杳无消息！虽然在重庆、桂林、昆明……甚至于曲江、西安……的坊间，都有《关于女人》出售，而却仍是“初版”……我写信到天地社去问，回信却说“初版”五千册，除了雨渍鼠咬之外，还有一二百本没有售出，最后他们引咎自己“推销不力”，向我道歉。我觉得很惭愧，没有话说。虽然国内各报的“文坛消

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 Best—Seller in Chung King”（重庆最畅销的书）。因此，我便把这本小书改正了交给开明书店……

从那时起，即使我远在日本期间，开明书店也照期不误地给在北平的谢家寄去稿费！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叶圣陶前辈的文章，说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解放后的北京，叶老看了文章后，纠正我说：我们初次见面，不是在解放后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嘉庐。我昨天从电话中问叶至善同志，他说，那次见面也是为了《关于女人》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事。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的叶老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事，多么好的老编辑，多么严谨的老学者呵。像我这么一个散漫的人，在叶老面前，只有拜服惭愧。

我早就知道开明书店一直刊行了许许多多很有影响的图书杂志。至于他们严谨的编辑作风和与作者的密切关系，我都亲身体会过了！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的活动里，我愿写上通过叶老和巴金、和开明书店的这一段因缘，并致最深的敬意和谢意！

（本篇最初发表于《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 8 月初版。）

为《华侨世界》创刊号题词

千百年来散居在五洲四海的广大爱国侨胞，对于祖国的进步和建设，是有过巨大的成绩的。现在因《华侨世界》刊行之便，我祝愿千百万海外侨胞，特别是闽籍华侨和祖国人民一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通过这个刊物以各种文学形式，来互通信息，交换意见，同心协力，为祖国和我省的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冰心

1984年12月9日

（题词最初发表于《华侨世界》双月刊，1985年第1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信拜读，您的夫人开刀及时，经过良好，至为喜慰！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癌疾，因早发现动手术后，十几年过去了，都未再发。您的爱人年轻，就更好了！

稿费通知单收到多日，北京银行来的只有号码，我因为没见过汇票，不知是上海来的（昨天我儿子进城才取了来），所以我请您代买“平装”时，说是从稿费中扣。兹由邮局寄上三十元，请查收，谢谢！第一、二集不必补了（精装送人的我有底子），我忘了都给了谁，要的人多，未记。勿书并颂
撰安！

冰 心

十二、十

致 陈 恕

亲爱的陈恕：

接到你的第二封来信，心里非常不安，你住得不安静，吃饭又用电炉，太费时费事了！我在美国留学时，也用电炉作过饭，但是不用自己花钱，而且有两个电炉，几个同学一同说说笑笑，一面做的，不着急，也不赶用。我认为你不要省钱，不要惦着买什么东西回来。东西是小事，身体要紧，不要搞得自己病了，倒麻烦了。家里都好，吴青整天忙她的，有时晚上也不在家。北京已凉，不过阳光还好，Daddy 住院，夜里周师父看，Daddy 说他很警醒，比小张强。他白天不要人，今天已开始治疗帕金森病。我们前天去看他，他还满意。大姐很好。我仍是一样，瞎忙，身体还可以。家里一切你放心吧，只顾照顾你自己，哥哥也好！

娘

十二、十二。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我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这次盛大的作家代表大会，这不但失去了和许多老友重逢的机会，而且见不到许许多多年轻的文坛新星。我感到万分遗憾，这是我的无从弥补的巨大损失！

光年同志在会前让我读了他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这篇极其精彩而又充满了惊喜的激情的报告，把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全局的问题，讲得十分精辟而详尽。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他提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刚刚在奔腾澎湃的生活激流中绰约闪耀”的上面，用了“它的健美的姿容”字样。这“健美”两字，我认为就是新时期新人作品的特点。四年来，我闭门不出，整天除了看书，就是看书！因此我也深深体会到光年同志所说的：“我在阅读那些堆满案头的优秀作品的时候，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突出了一个“新”字。我自己阅读的体会是：“健、美、新”这三个字，代表了、

突出了新时期新人作品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

光年同志在提到巴金同志曾为自己能看到新生力量而感到光荣自豪的时候，引用了巴金同志的话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作品，已超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看到这里曾笑着对光年同志说：“假如这些年轻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出现在二十年代，那我就无论如何，不敢提笔作文了！”真的，作为一个妇女，我特别兴奋的是：文学新人中，女作家人才辈出。真如光年同志所说的“文坛女秀，群星灿烂，群凤朝阳”。我每次打开书刊，首先阅读的就是女作家们从她们“敏锐的头脑、细致的笔触”，写出的种种文学形式的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我相信女作家大量涌现的潮流，还是正在开始，还在奔腾澎湃地开始！

最后，作为一个文坛老卒，虽然老、弱、病、残，步履迟缓，我仍决心追随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文艺大军之后，把自己的文艺工作，“同实际生活的深刻变革相印证，同文学战线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凡是做对了的，就坚持下来。不对的，就坚决改正。”特别是“凡是有利于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我“一定拚命干，不利的，不干，坚决不干！”

不敢多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我的话就说到这里吧。预祝大会圆满成功，一定成功！

谢谢大家！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摘要发表于《北京日报》1985年1月1日，全文刊于《光明日报》1985年1月3日。）

致 陈 恕

亲爱的陈恕：

今天已是圣诞节前夜了。正好李素英给我寄来美金廿元，我就给你贺礼吧，省得你几个 P 的、几个 P 的舍不得用。家里都好，你不在家，大家都想你！老二更累了，大姐最忙，她总管一切。Daddie 还可以，这一冬能在医院过了就好，仍是日夜有特护，我们在看视的日子轮流去看他。你自己保重，完了事早早回来！祝你一切如意！

娘

十二、廿四

致 臧 克 家

克家同志：

谢谢您的贺年片，我还好，文藻因胸部不太好，自十月五日起，到北京医院治疗，已两月有半，情况尚好，勿挂。敬祝

新年清吉

冰 心

十二、廿九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